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 ① 全国文明城市
- ② 东夷文化发祥地
- ③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 ④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 ⑤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⑥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 ⑦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 ⑧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 ⑨ 中国市场名城
- ⑩ 中国地热城
- ⑪ 中国书法名城
- ⑫ 国家园林城市
- ⑬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 ⑭ 国家卫生城市
- ⑮ 国家森林城市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秦鸿伟 刘广阔
李洪彦 赵建民 王长利
赵宗远 刘兆东 李凤军
刘耀华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刘振本
钱 进 尹传贵 赵 强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伊永航
段 洪 于 芹 王卫东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王庆和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高来臣
贾 梦 孟玉石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奔赴山东 郭洪涛 04

【峥嵘岁月】

沂南大王庄突围 王 芳 08

我党杰出的情报工作者纪纲 刘海洲 12

铁军大帐追歌行（三）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16

【名人素描】

也说庄陔兰 莒国风月 22

王雅量传略（下） 王如良 26

【文化掇英】

珍贵的“活化石”
——胡怀梅与她讲述的民间故事 靖一民 30

丹青为人民，笔墨随时代（二）
——记著名画家皮之先 刘瑞轩 35

【探索发现】

抗战旧址之——青驼山东战工会成立旧址 国 英 39

何万祥：沂蒙山抗战的旗帜 高 雷 40

【史海撷萃】

萧道成：从称臣到称帝 吴海艳 46

【诗画赏析】

四神刻石 高 昂 50

	抗战歌曲选——《跟着共产党走》	本 编	51
【影像沂蒙】			
	沂河桥的故事（下）	本 编	53
【文史论坛】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争（上）	赵 炯	55
【百家渊流】			
	姓氏百家漫谈——朱姓（一）	赵丹峰	60
【典籍考辨】			
	丁守存和《编年自记》（上）	丁兆铭	64
【文明之星】			
	超越血缘的爱		
	——记李保叶	于潇潇 张圣虎	71
【沂蒙名医】			
	一个排球女将的“悬壶之梦”		
	——李琪其人	胡爱军	74
【史志动态】			80

封面：青驼山东战工会成立旧址

（详见本期《抗战旧址之——青驼山东战工会成立旧址》）

封底：乐易者常寿长，忧险者常夭折。《荀子·荣辱》 /胡石 书



地 址：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0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奔赴山东

郭洪涛



郭洪涛（1909—2004年），又名郭洪恩、郭惠卿，化名孙耀祖。陕西省米脂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是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之一，新中国交通事业的开创人之一。1938年4月，郭洪涛等到山东省委工作。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成立，郭洪涛任书记，统一领导山东与豫皖苏边区的抗日武装斗争。1945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建国后，历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务院第六办公室副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2004年3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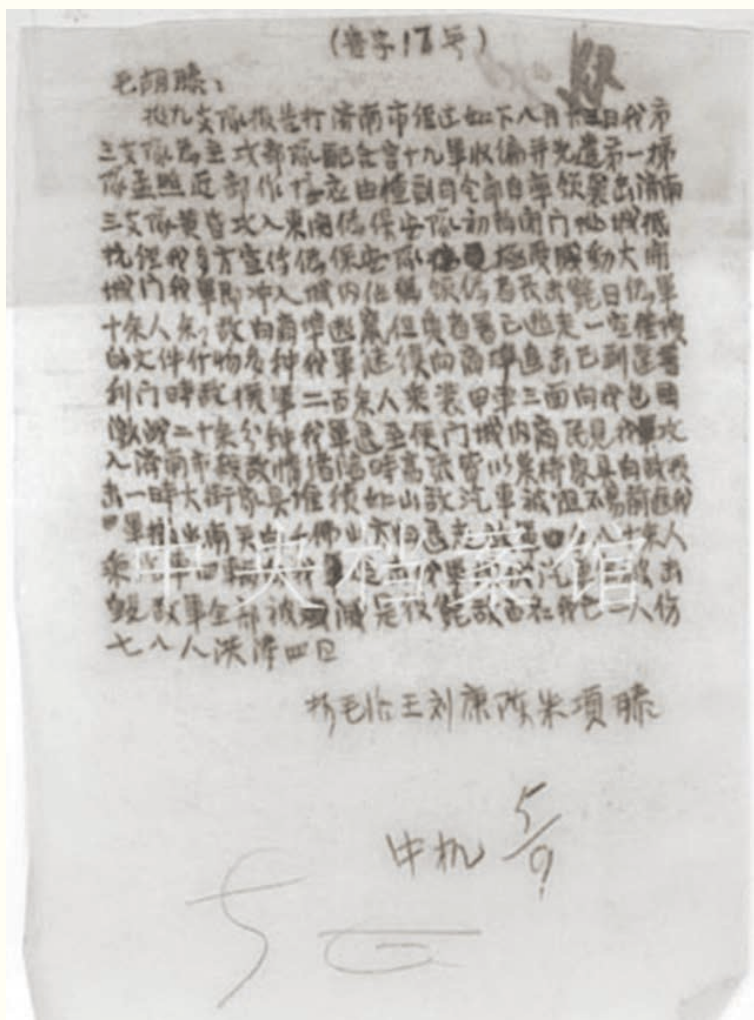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大举武装侵略，妄图吞并我中华大地。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我党中央高举抗日大旗，号召全国总动员，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蒋抗日，争取抗战胜利。在侵华日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至1937年末，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陷落，黄河以北的主要交通线被敌军侵占。

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共山东省委于1937年7月中旬在济南召开会议，研究了如何领导山东人民进行抗战的问题；决定组织抗日游击队，发展抗日救国民众团体，加强抗日宣传。9月，省委又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和组织抗日武装的十条纲领及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10月，日本侵略军进犯济南，山东党组织先后发动了冀鲁边、天福山、黑铁山、鲁东、徂徕山、泰西、湖西、鲁南等武装起义，组建了多支抗日武装，对敌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收复了黄河以北十多座县城，有力地配合了津浦前线正面台儿庄战场的作战，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功不可没。山东抗日战争的形势很好，急需增加军政干部。1938年4月，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向党中央汇报山东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情况，请求派干部去山东，得到党中央的同意。

我原在陕甘宁边区党委担任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曾请求毛泽东同志派我到前线去，抗击日本侵略者。在黎玉同志代表山东省委提请中央增派干部去山东工作之后，中央委托陈云、李富春同志征求我对到山东工作的意见，我欣然同意。中央很快作出决定，派我和罗炳辉（后改为张经武）同志到山东省委工作。当时，山东黄河以北地区归冀南区党委领导，其他地区归山东省委领导。中央选拔了约50名军事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和我同去山东。这些干部有的是抗大学员，有的是中央党校学员，有的是陕甘宁边区干部，也有中央机关的干部。根据我的回忆和《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的记载，他们是：段君毅、霍士廉、王文、高克亨（后到）、杨国夫、高锦纯、钟辉、钱钧、何光宁、周赤萍、刘勇、王彬、史秀云、苏杰、刘建中、吴瑞林、鲍辉、白炎波、戴凤鸣、黄志才、赵纯、孙光、罗春生、刘圣永、闻述尧、杨刚毅、杜明、李国厚、张正富、潘维周、罗绩伟、吴坤、杨士敬、王子文（即王海珊）、陈宏（后到）、白备武、马千里（后到）等同志。并配备了两部电台和报务人员。

我们离开延安前，毛泽东同志接见了全体干部，并作了重要指示。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我华北、华东大片国土，侵占山东后继续南进。李宗仁部正在台儿庄阻击日军。我们党的方针，是在山东敌占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山区的游击战争是可以坚持的，也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平原的游击战争能否坚持，还没有经验，需要看一看。毛泽东同志希望我们全体同志到敌后，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都能活，像松柏一样天寒地冻也是青枝绿叶；要服从当地党委领导，同当地党委搞好团结；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要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民兵、基干武装和主力部队，创建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给予我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大家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我在同年3月间曾听过传达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认识到是完全错误的。随后，我找刘少奇同志请他再做一些指示（霍士廉同志与我同去）。刘少奇同志对我讲，山东敌占区国民党已恢复政权，鲁西北的范筑先和我党共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这个形式很好。要我转告山东省委驻鲁西北代表张霖之同志，坚持这个方向；并指示我到山东再找第二个、第三个范筑先式的人物搞统一战线，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另外，他还谈到苏鲁豫皖边特委离河南省太远，我去后，即归山东省委领导。

到山东敌占区去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是为实现这项任务到山东去的。1938年4月，我们一行乘三辆汽车离开延安去西安，陈云同志亲自送行。给我们很大的鼓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途经洛川住了一夜，第二天到达西安后，住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我们是以八路军的名义去山东敌后的。经办事处与国民党当局交涉，我们换上八路军服装，领了八路军护照，即乘火车到河南省柳河车站，步行至曹县。当时，李宗仁、白崇禧的司令



1938年9月4日，郭洪涛关于我三支队等攻打济南市击敌情况给毛泽东、刘少奇、滕代远的电报。

部在台儿庄阻击战胜利后撤到了曹县，正为台儿庄阻击战的胜利召开祝捷大会，邀请我们以八路军的名义参加这个大会。我在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大意是：对友军英勇作战取得的胜利表示祝贺；着重说明我党我军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并且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占领了我国大片领土，这是暂时的。日本帝国主义是能打败的，台儿庄阻击战的胜利和八路军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就是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向前推进，我们就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为配合保卫武汉的正面战争，我们马上就要到鲁中去，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狠狠地打击侵略者，直到把他们赶出中国去。我的讲话，博得了群众热烈的掌声，表现出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信任和期望。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害怕我们扩大影响，当晚他指使公安厅长来到我们驻地，要我们离开曹县县城，并声称对我们的安全负不了责。

为防范国民党顽固派的暗害，我们找到范筑先专员驻曹县的省政府办事处主任何白沙同志联系，要他们协助我们安全离开曹县县城。翌晨，何白沙同志即安排一辆大卡车，分两批送我们离开。我和一部分干部携带电台先到100多公里外的黄河边，转乘小船北渡黄河至寿张县，第二批到更远处下车步行，脱离了险境。

途经鲁西黄河边时，我派人请来张霖之同志，向他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我党和范筑先合作建立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到达泰西，我与张北华同志接上头。张北华同志谈了组建泰西区抗敌自卫团，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我当即表示，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并确定组建泰西特委，段君

毅同志任书记，万里、孙光、张北华同志分别担任宣传、组织、军事部长。抗敌自卫团主席由张北华同志兼任，政委由段毅君同志兼任。从延安来的何光宇同志任自卫团副主席，李国厚、张正福等军事干部也留泰西工作。在泰西的特委会议上，我和段君毅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要求按照指示进行工作。

万里同志亲自率领部队护送我们过了津浦铁路，由第四支队接我们，于1938年5月20日到泰安市南上庄省委驻地，与省委宣传部长林浩同志见面，我们一行胜利到达了目的地。

1938年5月21日，山东省委在泰安南上庄召开了干部会议。在会上，我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指示，作了《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斗争》的报告。我在报告中提出，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几个主力支队逐步改为八路军的番号，取得合法名义；广泛地组织与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帮助政府和军队抗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坚持党在统一战线内的领导权与自主权，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直到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会议经过讨论，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确定创立以鲁中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向北以淄博山区为依托，开创清河地区游击根据地；向南开创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向东发展开沿海地区抗日根据地；在津浦铁路以西，创立梁山泊和微山湖西的根据地；在胶东创立以大泽山为中心的根据地。会后，省委将这个计划报告了党中央，6月30日，又作了补充报告。7月4日，毛泽东同志电复省委：“这个战略计划很好，望即照此去做。”八九月间，在沂水县岸堤召开会议，研究了开辟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问题。会议认为：沂蒙山区地势险要，我党与国民党山东第三区专员张里元以及当地的一些开明士绅建立了较好的统战关系，有利于坚持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在这一地区建立根据地，对坚持山东抗日游击战争具有战略意义。因此，我们进一步确定了在沂蒙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省委机关即设置在岸堤。

为了实现开辟鲁中沂蒙根据地的战略中心地带，省委决定调第三支队一部分，第八支队进入沂蒙。1938年8月，第三支队一部分在司令员廖容标率领下南进沂蒙；10月，第二支队第八团又南越胶济铁路进入沂蒙，与先期进入沂蒙的第三支队一部分合编为第四支队第四团。11月开始，第八支队全军5000余人在司令员马保三、政委张文通率领下分批南下，陆续抵达沂鲁山区，指挥机关驻临朐县、三岔店（今沂源县）、暖水河一带。第八支队一部分东进沂水东北部、安丘西南部活动，控制沂山山区。1939年3月，胶东地区的第五支队第六十一团大部在吴克华、阎世印两同志率领下进入鲁中临沂、费县边区，活动于蒙山东南麓。有了较为强大的武装支持，创立以鲁中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计划终于得以实现。

沂南大王庄突围

王芳



毛泽东与王芳

1941年11月2日晚上，4000余日军在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亲自指挥下，秘密出动，不走大路，不经村庄，突然包围我驻马牧池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幸好纵队机关已经转移。

由于纵队机关与我们一旅驻地相距数十里地，对这一紧急情况没有立即知晓。而几乎与此同时，一旅机关也被日军重兵合围。敌人气势汹汹，妄想一举消灭这一鲁中主力部队。

此时一旅所属部队一、二、三团按上级反“扫荡”指示，已经突出敌人重围。一团由旅参谋长钱钧带领前往新蒙边界游击区；二团由副旅长胡奇才带领前往泰、泗、宁地区；三团已去蒙山。由于旅领导要召开地方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布置反“扫荡”措施和任务，因此旅首长和机关突围时间晚了一天。旅首长原计划跟纵队机关一起走，因为他们有侦察营，有电台，消息灵，容易突围。那天晚饭后，天已很黑，旅首长下令全体人员往马牧池快

王芳，男，1920年出生于山东新泰。1937年10月参加革命，1938年2月参加八路军，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支队锄奸科长、敌工部长、旅政治部主任、兵团保卫部长。1949年杭州解放后，任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此后，又先后担任浙江省副省长，代理温州地委书记兼温州军分区第一政委，宁波地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83年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87年3月任公安部部长兼武警部队第一政委。1988年3月，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

2009年11月4日在杭州逝世，享年90岁。

速行进。到了夜12时左右部队接近马牧池，命令暂停行进，侦察连派人进去探问情况。不料被敌人打了出来，原来马牧池已经被日军占领了。情况已发生突变，我们立即改变行动方向，部队迅速上了西边的丘陵。

王建安司令和周赤萍政委先把我叫去，讲了部队当前面临的紧急情况。然后又把政治部总务科长景宜亭、司令部管理科长马冠三叫到跟前。他俩神情严肃，语气平静地说，看来敌人对沂蒙根据地已完成了战略包围。根据目前我们的处境，部队要安全突围出去，行动方法只宜分散，不宜集中。司令和政委决定机关人员和部队分开行动。一、二、三团已按计划分头突围。他俩带领警卫连、侦察连、电台，在敌人包围圈内活动，观察敌人动向，然后伺机突围出去。要我们三人组成领导班子，主要由我负责，带机关人员在天亮前突围出去。我觉得马冠三、景宜亭长期搞机关工作，部队比我熟悉，建议由他俩负责。政委说，地方你比他俩熟悉，马、景配合你，就这么定了。领导既然这样说了，也就是命令了，我也不再推辞。司令、政委还交待我们，怎么行动都可以，只要能突围出去就是胜利。

这些人都是旅机关10多个科的干部，还有机关直属部队的通讯连、便衣侦察连、政治部、警卫连、宣传队、民运大队，以及一些勤杂人员，共计800多人。如果遇上敌人，我们的武装力量只有警卫连的几十位战士。机关干部中只有科以上干部才配有自卫手枪，其他人员都是赤手空拳，尤其是几十名妇女同志，在情况紧急时行动还得有男同志照顾才行。

司令、政委交待的任务非常明确。情况十分危急，敌人就在跟前。我们不能有片刻的犹豫和停顿。我决定部队直奔南墙峪。那里是当地最高的一座山，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便于隐蔽，是个比较理想的地方。走了一夜，我们到了南墙峪山下。发现山下有哨兵，哨兵的衣服和我们一样，一问原来是纵队机关和特务团，他们在日军包围马牧池前迅速撤离，也选了这个地方，凌晨赶到这里，比我们先上了山。

等我们上了山，已是早上八九点钟，由于纵队机关的目标很大，日本鬼子追踪发觉后迅速包围了这座山。纵队特务团和日军打了整整一天，我们勇猛反击，阵地始终没有被敌人占领。但是我们部队的弹药和粮食很有限，必须在夜里突围出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问纵队参谋处的人员纵队机关往哪里去，他们说往蒙山方向。我认为往那里突围，方向是正确的。我决定跟他们一起走。我知道那里是敌占区和根据地交界，日军力量相对薄弱，便于展开敌后工作。

突围开始了。我指挥大家跟着纵队机关走，他们有部队，情报也清楚。开始果然比较顺利，但经过芦山时，此地已被日军占领，中了敌人埋伏，发生了战斗。好在是夜间，目标不清楚，互相对射，伤亡不大。可是纵队机关被打散了，部队和机关部分人员突围出去了。幸好我们一旅机关没有被打散，也没有伤亡。没有突围出去的300多名纵队机关的同志要求和我们一起行动，合在一起，我们队伍增加到千余人。这时天快亮了。我们处在芦山脚下，山上是日本人，一旦发现我们就会被歼灭。

必须赶快离开这里。但是往哪里走？芦山在我们的北边，西北方向的黄草关已能隐约看见日本军旗——那里被敌人占领了；西边是丘陵地带，虽然便于隐蔽，但村庄多，容易暴露目标；南边是敌占区，后面又有敌人在追击。这时东边已开始露出晨光。敌人近在身边，随时有被敌人发现的危险。

最紧张的时刻到了。我知道这时干部和家属的眼睛看着我，等我作出决定，景宜亭和马冠三不熟悉周围地形，也急切地催我赶快下决心。千钧一发，事不宜迟。而我作出的最后判断是错是对，关系着千余人的生命。有几个胆子小一点的干部家

属紧张得哭出了声来，有人在轻声安慰他们。这些家属和女同志绝大多数没有打仗的经历，遇到这种情况，难免非常害怕。这时我一再告诫自己，必须镇定和冷静，绝对不能盲目指挥。如果我选择的突围路线错了，我们这个1000多人的队伍，很难在敌人枪口下脱险，难免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我17岁入伍，4年来，第一次接受这样危急的任务，压力是很大的，但我头脑始终是清醒的。我仔细地看地图，脑子在迅速思考着、比较着。最后我把突破口选在大王庄的西南方向，那里有一条大河，地势开阔，冬季水较浅，可以渡过去。我估计敌人不会在那里设埋伏，很可能是个空隙地段，因为我当时考虑敌人这次“扫荡”重点是山区村庄，他们会认为只要守住道路村庄，占领山头就行，不会想到我们会从大河过去。

我的决心一下，大家立即行动。

河水冰冷刺骨，河中间有两三尺深。河面有六七十米宽，开始时卷着裤腿，但很快被浸透了。男同志扶女同志，体强的帮体弱的。我在队伍中间，一边淌着水，一边轻声鼓励大家。只听到哗哗的涉水声，部队紧张而有秩序地前进。到对岸了，大家拧着湿透的衣服裤子，跺着冻得发麻的双脚。我注视着四周的动静，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内心稍许安定了一些。但我清楚，敌人离我们路程很近，不能有丝毫麻痹。我说我们还没有完全从敌人包围圈中突围出去，这里依旧很危险，不能停留，加快速度，直奔黄豆山。我们跑步行进，家属和女同志跑在队伍中间，一口气跑了四五公里路。这时大家不仅不感到冷，反而额头冒出汗了。

上了黄豆山，太阳出来了。我们千余人安全突围，没有一个伤亡，没有一个掉队。尤其是家属们，虽然受了惊，吃了苦，这时显得特别高兴。

不久，在芦山被打散的纵队敌工部的一部分人，通讯营的两个连，还有反战同盟的全体人员，包括十来个日本人，也跑到山上来了，要求和我们一起行动。他们吃惊地问我们是怎么来到山上的，我们告诉他们突围的路线时，敌工部通讯营的营长说，你们如果走别的任何一条路，肯定全军覆灭，根据得到的情报，敌人已经盯上你们了。你们虎口逃生，真是好运气。

这时又得知，纵队后勤处的一名科级干部带领十几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突围，隐蔽在芦山脚下树林里，想等到夜里天黑再走，结果被日本鬼子发现包围后都被残



1940年9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8支队团以上干部合影。后排右九为王芳同志。

忍地杀害了。

我说大家绝对不能麻痹，我们还没有最后脱离敌人包围圈。但是不少人经不住两天紧张和疲劳，随便躺下睡着了。我毫无睡意，依旧百倍警惕地注意四周的一切动静。我反复考虑选择一条路线，如何安全地把千余人带出敌人包围圈。

在山上紧张地过了一个白天，我决定晚上向太、泗、宁地区转移。因这一带的地形和地方政府我都熟悉。这里是平原，我们沿着太、泗、宁公路一侧小路走。一边走一边观察公路上敌人的动向。天亮前，我们到了下峪。这里有上峪、下峪两个村庄，村民同喝一口井水。由于我们队伍中日本反战同盟的几个日本人要睡觉，我们就安排他们住进老百姓的家。这几户老百姓听到这几个人讲日本话，第二天早晨到上峪打水时说，下峪被日本兵占领了。当时上峪有秦启荣的部队，一听下峪有日本人，吓得立刻跑了。如果秦启荣这个反动顽固分子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后果不堪设想。

我让大家在下峪稍事休息，天一黑，赶紧上路。紧急行军一夜，全体人员到了马头庄。这里的老百姓告诉我们，二团的部队就在离马头庄不远的查河一带。马头庄在平甫山的半山腰上，在山顶放两个哨，可以监视远处孙村伪军和张庄煤矿、新汶铁路的敌人活动情况。因此部队暂时驻扎在这里是比较安全的。

安排好队伍，和马冠三、景宜亭商议了一下部队紧急事项，我立刻骑马赶到二团驻地。团长吴瑞林、政委李伯秋还有副旅长胡奇才见了我很高兴。他们吃惊地问我突围的情况，并告诉我，纵队和旅领导及部队都已成功突围。我一直提着的心一下子放下来了，讲了十来分钟带领旅机关安全突围的经过，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几宿没有好好合眼了，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现在一松弛下来，困意就挡不住了。他们把我搬到一张板床上，总算美美地睡了一个舒坦觉，醒来，已是傍晚时分。

与此同时，二团派人去马头庄与马冠三、景宜亭联系，迎接全体人员胜利突围。

在这次敌人的大“扫荡”中，我根据地遭受巨大破坏，许多村庄变成了废墟。马牧池一村，曾遭敌三次纵火，沂水南寨村仅130户人家，青壮年被敌人抓走80人。但是，根据地人民群众以顽强不屈的精神与敌人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发扬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为赢得反“扫荡”的胜利作出了无私奉献。

我党杰出的情报工作者纪纲

刘海洲



李鸿宝（纪纲）

纪纲，原名李鸿宝，1903年农历正月十五出生于山东省沂水县东北山区埠前村的一户地主家庭。其父李发仑是位开明绅士，知道读书的重要性，聘请塾师课读子弟。李鸿宝，聪颖过人，胸怀大志，6岁入塾学完私塾先生的知识后，又去沂州、济南等地求学。1925年，李鸿宝回到家乡，卖掉了几十亩土地，筹集资金开办了一所平民学校，一边传播文化知识，一边宣传进步思想。1927年2月，回原籍养病的共产党人李清漪（沂水县下胡同峪村人）介绍李鸿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李清漪在沂水县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入党后的李鸿宝，在李清漪的介绍下，与沂水另一个共产党员王敬斋等取得了联系，从此李鸿宝便走上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开始了他一生曲折而又辉煌的人生历程。

李鸿宝是沂水早期党组织重要领导成员，为沂水抗战前党组织的发展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是我党情报战线上优秀的干部，他领导的情报系统为我党我军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报，为我党我军夺取革命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2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批准建立沂水特别支部，指定谢梅村为特支书记。谢梅村与李鸿宝取得联系后，李鸿宝把埠前村及周围村庄的党员联系起来，并在十余个村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8月，省委决定将沂水特支改建为沂水县委，县委由5

人组成，李鸿宝为县委委员。1933年夏，山东临时省委书记张恩堂秘密来到沂水。他此行的目的是组织、指挥沂水举行武装暴动。其时中共沂水县委住在李鸿宝的家里，张恩堂到沂水的第二天，李鸿宝就把他接到埠前村，带他到各村了解情况，并积极参与商讨暴动事宜。1933年5月18日夜晚，参加沂水武装暴动人员在葛庄暖阳河畔（今跋山水库库底）集合，准备攻打沂水县城，救出被关押的省委特派员马德隆等共产党员及部分大刀会首领（这被关押的13人于7月3日被反动派杀害），因突然天降大雨、人员不齐而取消了这次暴动计划。李鸿宝是这次武装暴动的组织者之一，事后县衙多次派兵到埠前村抓捕李鸿宝，他不得不于当月下旬流亡东北，在辽宁省安东（今丹东市）以开诊所（他精通中医）为掩护，寻找党组织，并于此时改名为“纪纲”。

1935年5月，纪纲到上海后终于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被派到上海中央情报科工作。1940年5月调往南京，任中共南京情报小组负责人。在南京，纪纲仍以行医为掩护，在日伪各种组织、机构中发展内线，收集情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领导的情报系统中，有两个重要的情报干部，一位是汪锦元，曾留学日本，被安排在汪精卫身边当秘书。汪锦元成功获得了汪精卫与日本人谈判的秘密资料。日汪密约被我党揭露后，引起全国激愤，教育了全国人民，激发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斗志。这一情报的成功获得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赞赏。另一位是陈一峰（陈汝周），此人是汪伪中央通讯社采访部主任，他与一个日本进步记者经常交换日伪方面的情报。1942年7月，我党在南京的情报小组暴露，日本宪兵抓捕了纪纲、汪锦元、陈一峰和郑文道，郑文道在被抓捕时壮烈牺牲，纪、汪、陈三人被押往日本。日本东京战时法庭判处三人死刑，后经陈璧君等人交涉，三人被改判无期徒刑，并被押回国内监狱。

1945年春，日军失败已成定局。日军为了缩短战线，妄图与在华中的新四军取得某种默契，于是想到了被关在狱中的纪纲，想通过他与新四军搭线。纪纲被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从监狱放出后，找到了新四军总部，中央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请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扬帆接待并查证纪纲的身份。扬帆经多方查证，弄清楚了纪纲的真实身份。对于与日本人接触，因事关重大，华中局请示了中央，中央批准可以和日本人秘密接触，目的是为了了解日方的意图，并交代了不与日军谈判具体细节的原则。1945年6月，纪纲带了冈村宁次总部的三个日本人到我军防区，我方派彭康（华中局宣传部长，曾留学日本）、梁国斌（新四军保卫部部长）、扬帆三人代表接谈。日方为首的叫立花，是冈村宁次总部参谋处二科对共工作组组长，他们提出局部和平的意向，我方拒绝了。日本人以为我方嫌他们身份低不信任他们，因此又提出希望我方派负责官员去南京和冈村宁次总部首脑直接洽谈，甚至表示他们愿意留下作人质。我方考虑正式派人去和日方上层接触，可以进一步观察了解日本人的意图和动向。于是华中局决定派扬帆前往南京。扬帆在纪纲夫妇和三个日本人陪同下到达南京，住在日方安排的将校招待所内。在南京，扬帆和纪纲等人多次与日本军官见面，日军一再提出“希望达成局部和平”的要求，但我方不谈具体问题，而是纵论国内国际局势，揭示反侵略战争胜利在望的前景。最后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日本天皇的胞弟）以冈村宁次的名义用西餐招待了我方人员，他知道要具体谈判已不可能，便说：“具体问题先不谈，希望保持联系。”这次与日军接触，基本上摸到了日本人的意图，亲眼看到日本上层军官虚弱而低沉的情绪，他们回来向华中局、军部并向中央作了汇报。

1945年8月13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告接受《波茨坦公告》。14日，华中局立即派扬帆和纪纲赶去南京找冈村宁次谈判受降。纪纲见了日军指定



南京情报组（左起：汪锦元、陈一峰、西里龙夫）

和我方联系的立花等三人，日方答复是：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希望我方谅解。在南京期间，纪纲和扬帆亲眼看见国民政府也派去了受降人员，在受降无果的情况下，他们便返回了。

新四军在抗战期间和日军接触过这件事，后来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利用，污蔑中国共产党不抗日。十年之后的1955年，饶漱石、潘汉年、扬帆、纪纲等人因此事被定为“特务反革命集团”遭到逮捕。与日方接触是经过中央批准的，但公安部却否认中央知道这件事。新四军与日军接触这一大事件，牵扯到很多高级干部，多少年来争议不断，起因全在纪纲一人身上！

日寇投降后，新四军军部奉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令北上临沂与山东军区合并。饶漱石指示纪纲到情报处工作，让他成立个机构，从事敌区的情报工作，理由是纪纲懂得这一行。1946年1月起，纪纲任山东军区情报处驻济南办事处主任、中共华东局统战部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任务是从党政军部门物色选拔培训专业情报干部，开展敌区情报工作。纪纲本人的生活也给予特殊照顾，配备警卫员，吃小灶。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纪纲领导的“城委会”搜集情报，策反敌军，做了几件非常出色的工作。他培养、发展的主要情报人员有：

一、发展国民党军总参谋长办公室机要参谋聂岳撼为内线。聂提供的绝密情报有：国民党全国陆军战斗系列；为总参谋长陈诚去东北视察而专门编写的孤本重要情报资料密件；国民党陆海空军1947年总结及1948年作战计划。聂岳撼又发展了国民党联勤总部中校供应科长洪承武为内线。淮海战役期间，被人民解放军围困在淮海前线陈官庄的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报请蒋介石立即空投防毒面具20万只，南京当局已经同意，并命令联勤供应科立即实施空投，妄图施放毒气突围逃跑。洪承武得知这一情况后，紧急报告了他的上线，在接到指示后，他借故拖延，最终防毒面具空投未成，国军施放毒气的计划失败。

二、1946年7月，纪纲从山东大学英文班亲自选调派遣王耀华做情报工作。王曾在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举办的子弟学校自忠中学任英文教员。王耀华发展了知交好友、国民党59军38师少校参谋陆迪钧为内线。陆迪钧与三绥区副司令张克侠关系密切，通过陆的引荐，王耀华认识了张克侠。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张克侠急找王耀华：“希望你转告上级党速派有权威的代表前来共商大计。”组织上决定派朱林为代表前往，经过四夜长谈，终于促成张克侠起义。张克侠还介绍朱林与三绥区另一位副司令何基沣晤谈成功。11月8日，张、何率五十九军、七十七军两个军的三

个半师23000余人举行战场起义，使华野大军得以直逼徐州城下，为我军进攻打开通道，并为迅速围歼黄百韬兵团赢得了时间，这是淮海战役序幕的一大胜利。

三、“城委会”派驻南京、上海工作的情报干部倪锋。倪锋于1948年发展的地下秘密组织“福建青年解放军”，核心骨干大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学生，在陈志宏、邓敬熙带头下，不避艰险，广泛进行活动。他们在我军进逼福州之前，做了两件重要的工作，一是争取了地方实力派海军宿将萨镇冰，二是英勇无畏地同福州市长何震公开谈判，要求何震领导的市政府“原封不动听候接管”，井然有序地组织群众迎接解放军入城。这些光辉业绩已载入福州史册。

四、由城委会从郝鹏举部属中发展的干部张正平。张正平经培训派出后，辗转回到东北家乡，同我军四野情报部门取得联系，打入长春市开设粮店，通过供应食粮，结交被围困在长春的国民党各部守军，曾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为解放长春发挥了重要作用。

纪纲于1948年济南解放后被派往济南工作，从此离开了情报战线。以上所述仅是他情报工作中的一部分成绩，至于他到底为我党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情报，就是安排他搞情报工作领导人（后期是饶漱石，抗战时是谁指示他搞情报工作的，至今不清楚）也不一定知道他的全部。

1949年5月，纪纲任山东省人民政府行政处长。1950年7月任外交部亚洲司专员、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1年任内务部社会司副司长、司长，救济司司长。

纪纲在上世纪50年代饶、潘、扬案件中被捕入狱。1965年，纪纲被定为反革命罪判刑12年（案由是纪纲“叛变投敌”，证据是被日军释放出狱），关押在山东聊城。直到1981年才得以彻底平反，恢复党籍，享受副部级待遇。平反后他回了一次阔别了半个世纪的家乡——沂水县埠前村，在子孙的陪伴下，看望了儿时的伙伴，到父母坟上祭奠了一番。他的晚年是在云南跟随长子度过的。1996年2月，历尽坎坷的纪纲在云南去世，终年94岁。

铁军大帐追歌行 (三)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皖南岩寺——沙场春点兵

(1938年4月5日——1938年5月5日)

岩寺新四军军部位于今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歙县著名古镇岩寺的金家大院。岩寺镇在徽州区东部，历为皖南重镇，是南路登临黄山的天然门户，素有“黄山南大门”之称，也是皖南山区最大的盆地之一，现为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政府所在地。

岩寺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文风昌盛、人才辈出，是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历史上就有“岩镇什七贾而什三儒”之说。最为著名者，一为徽州古建筑。置身这片只有9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数箭之遥，举足迎面，即见水、桥、祠、庙、寺、宫、塔、台、馆、园等诸多名胜古迹，尤其是鳞次栉比的古民间建筑，集中体现了古徽州建筑文化的鲜明特色。精巧的结构，雪白的山墙，黛青的房瓦，如面的门窗，宛如一幅幅优美悠闲安详静谧的田园图画，映入眼帘，如梦桃源。二为徽墨。在“文房四宝”中位置显赫的徽墨，从唐末直到明、清，主要集中于歙县、岩寺。所有这些，让人们既感叹祖先的勤劳与智慧，又由衷地感谢他们为后人留下了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与财富。

一、皖南古镇大会师，八省健儿汇铁流

1938年春天，皖南古镇岩寺，山绿水明，黄花遍地，莺歌燕舞，蝶飞蜂忙。这片一向静谧悠然的土地，一时间突然车水马龙、熙来攘往，军号嘹亮、呐喊回响，变得异常热闹起来。

三四月间，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四军的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各部，奉命到岩寺集结，近万人的大队人马，纷至沓来。

陈毅率领的第1支队，于3月间就先期到达歙县，进驻岩寺西北面不远的潜口镇，支队司令部住在本镇杨贡南家。潜口镇也是皖南历史文化名镇，尤以明、清民



岩寺军部旧貌



潜口第1支队司令部旧址



潜口第2支队司令部旧址



潜口第3支队司令部旧址

宅古建筑群最为有名，而且至今保存完好，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但是，我们寻访多处，却没有找到新四军当年驻扎时的旧址。

张鼎丞率领的第2支队，于4月18日急如星火地赶到岩寺镇，进驻岩寺附近的琵琶塘、琶村。支队司令部设在胡鼎臣家。琵琶塘村是岩寺地区自然风光最为美丽的小村庄之一。背倚青山，四季翠碧；绿水绕村，汇聚成塘，状如琵琶；山风吹来，碧波荡漾，犹如琵琶弦，幽然作声，琵琶塘村因此得名。据村民回忆，当年村中几乎家家住过新四军。在村民胡某的家中墙壁上，至今仍然保留着新四军2支队的战士们书写的宣传标语，字迹清晰可见。一位村民则把我们带领到一处残垣断壁的旧房屋处，十分肯定地指认说，这就是当年支队司令部的旧址。房屋的外墙壁上，至今也还保留有新四军刷写的大标语。

因张云逸在军部，谭震林率领第3支队，也于3月间到达，进驻岩寺西面数里的西溪南村、砖桥村，支队司令部设置于吴家大祠堂，领导人则住在西溪南村郑汝成等人家。这一片村庄处于平坦之地，建国后旧村庄大多几经改建，早已看不到旧时模样，故支队司令部旧址也无从寻找得到了。

叶挺、项英等率领军部机关与特务营、战地服务团，于4月5日进驻岩寺镇的金家大院。这个大院，是个历史文化厚重、建筑品格很高的所在。大院中有“洪桥”“进士第”两处最典型的代表性建筑。“洪桥”坐落在金家大院通往岩寺镇后街的小河之上，原名“洪福桥”，明成化五年（1469年）所造，4墩3洞，桥上有红漆木柱24根，置5间廊屋，设佛龛小屋。新四军军部进驻金家大院后，桥上小屋作为军部机要室、电报房，可谓得天独厚。当年叶挺军长在桥廊上与群众执手相坐，促膝谈心。“进士第”坐落在“洪桥”西头、大院正中，是明朝正德甲戌年（1514年）进士郑佐的府门牌楼。门楼为砖木结构牌坊，通宽9米，高6米，4柱3间。坊和匾全用烧雕青砖砌筑，雕刻精美。正中匾额由5块大方砖拼成，上刻“进士第”3个大字。军部进驻岩寺后，又于4月9日建立了兵站、修理厂，都设置于大院之中。

在军部与江南的第1、2、3支队在岩寺集中整训期间，第4支队将各部分别集中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镇，在高敬亭支队长率领下进行了集中整训。

二、上下思想大动员，项英明理却悖言

各支队集结后，叶挺、项英及中共新四军军分会的其他领导成员陈毅、张云逸、周子昆、邓子恢、李一氓等，立即赴各营地去看望和亲切慰问。他们热烈地握手拥抱，尽情欢呼诉说，个个热泪盈眶，场面感人肺腑。

此时，由于部队刚刚从各个“山头”上走下来聚集到一

起，加上有不少新成分，彼此不相熟悉；更加上许多人对新形势、新情况和党中央的新战略、新政策、新任务知之不多不深，急需抓紧统一部队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认识。为此，项英对各部队分别作了《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准备胜利战斗》的动员教育，使大家尽快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要求上来。与此同时，加强了对部队的群众纪律、组织纪律、军事纪律等方面的教育，还针对各部队的实际困难和状况，努力地帮助解决，增加给养，医治伤病员，补充弹药，等等。

鉴于新四军军部领导构成与领导体制的特殊情况，主要是明确叶挺军长的情况，4月中旬（一说4月26日），项英作为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在岩寺的鲍家祠堂主持召开了全军营以上干部会议。陈毅代表军党委讲话，传达了党中央对新四军组建、特别是对叶挺将军就任新四军军长的热烈祝贺及有关指示精神，介绍了全国的抗战形势和国共合作抗战的进展情况等。在热烈的掌声中，叶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再次向全军干部表达了自己真切、真诚、真实的内心感受与坚定、坚强、坚决的思想，他说：“同志们这样欢迎我、信任我，我实在不敢当。大革命失败后，如同爬山，大家不畏艰险，坚持爬到了山顶，而我却在半山腰停了下来。今天，党中央如此器重我，让我当这个军长，使我能有这个向同志们学习，和大家一起战斗，我深感荣幸！今后，我一定坚决遵照党所指引的道路前进，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在在座各位的帮助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的坦诚与赤诚，深深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项英作为党内一名资深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党的原则是清醒的，讲出的道理也是十分正确的。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三点：第一，要增强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不搞山头，不搞宗派，并要注意同外部的关系。第二，要发扬优良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第三，要很好地尊重和服从叶军长的领导。叶军长是北伐名将，有丰富的军事指挥和治军经验，希望大家要服从叶军长的命令，听从叶军长的指挥，努力完成作战和各项任务。项英如此要求大家，无疑是正确的。下级听他的话，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听自己的话。由于他已经开始对叶挺产生了不信任，以致逐渐发展，直至最后出现了“叶项不和”的局面。



岩寺动员教育会议

会议还请来新四军进行点验的国民党大员罗卓英介绍了抗战以来的经验与教训，要求大家引以为戒。

三、叶挺巧妙对点验，项英带头搞训练

新四军集结、动员完毕，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国民党军事当局的“点验”。所谓点验，就是清点核定部队枪械的数量，根据枪械的多少确定部队的编制员额，再根据编制员额多少发给军饷和军需物资。通过点验后，才允许部队开赴前线。这本来是蒋介石用来对付非嫡系部队的“削藩”手段，现在却用来对付新四军。他知道南方红军游击队是兵多枪少，普遍缺枪少弹、装备不足，因此，他可以借点验之机，尽量压缩新四军的编制，以免今后坐大做强。

4月中旬，蒋介石派到新四军的点验大员、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9集团军军长罗卓英率领一班人马，耀武扬威、趾高气扬地来到了岩寺。叶挺对此人并不陌生，他们是广东同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学、还是粤军时期的同事，但两人所走之路则是背道而驰：叶挺跟着共产党走上革命大道，罗卓英则攀附陈诚成了蒋介石的嫡系。罗曾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参加了对红军的第一至第五次“围剿”。1933年2月，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中，罗卓英任副军长的第18军作为第一纵队充当急先锋。由于第18军下辖各师太多，为指挥方便，陈诚请准蒋介石，临时决定成立第5军，升罗卓英为军长，下辖第52、59师。2月28日至3月1日，第52师在行进中被红军围歼，师长李明受伤自杀。第59师企图增援，途中又被红军包围全歼，师长陈时骥被生俘。这样，第5军尚未正式成立便全军覆灭，罗卓英只得再回18军任副军长。这段经历，让罗卓英在红军面前总觉得十分不光彩，虽然有“钦差大臣”的光环罩着，但总还是有点儿色厉内荏。

罗卓英到达岩寺不几天，便板起钦差大臣的面孔，开始发号施令。4月20日，他首先要求检阅部队。叶挺早有准备，一声令下，随着一阵阵嘹亮的集合号声，各部队雷厉风行，迅速整装列队，集合完毕。罗卓英本来想到新四军官兵面前抖一番威风，摆一下谱儿。指战员们虽然在衣着、武器等外表上没有国民党军队那样整齐鲜亮，但是从一个个高昂的头颅、一排排挺立的胸膛上，从骨子里体现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泰山压顶不弯腰、一往无前不惧难的气势，这让当年曾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的罗卓英不由得有些不敢直面。而陪同他检阅的叶挺，身着笔挺的中将制服，魁梧英俊，雄姿英发，一身正气，满腔热血，更让身材略显臃肿的罗卓英有点自惭形秽，似乎反而成了检阅的陪衬，他只得在满肚子悻悻然中结束了检阅。

罗卓英当然不甘心，除了要发泄出自己肚子中窝着的火，还得为蒋委员长尽到钦差之职，把新四军的编制压下来。他开始吹毛求疵、无端找茬了。

他先是在新四军的素质与战斗力上向叶挺发出疑问：“我看这些士兵身体都这么瘦弱，还有不合要求的老兵小兵，又都缺乏训练。面对强大的日本兵，你的这些兵能打仗，能打胜吗？”

叶挺针锋相对：“体质可以增强，训练可以补课。只要搞一次整训，部队的面貌肯定能改观。最重要的是，新四军战士都有觉悟，深知国家的危险，都有抗战的决心。说到军事战斗力，他们大部分人都打过仗，有比较丰富的作战经验。”

叶挺的话，一下戳到了罗卓英的软肋，堵上了他的嘴。

罗卓英也专找新四军的弱处发难：“就算人能打，可是武器也太差了。用这样的枪去和日本人交手，岂不是白白送命？”

叶挺顺手牵羊、将计就计：“武器确实不好，可现在是国民革命军了，正要靠

军委会和三战区帮助解决。我曾经向何应钦部长和顾祝同司令长官多次请示，希望能给我们补充一部分武器装备，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为了新四军更好地打鬼子，还望卓英兄回去后多向上锋进言，尽快拨付给我们一些武器弹药。”

罗卓英恨不得狠狠抽自己一个大嘴巴，只得直接在点验结果上再次发难，一再说新四军人多枪少，现在的编制必须再压缩，同时还威胁说：“新四军必须以现有员额定编，今后如果超编、扩编，将以破坏国民政府领导，违背抗日纪律论处！”

叶挺与项英也不与他强争，还表示可以按点验要求对员额再进行精简。然后，悄无声息地对部队进行了一些内部调整：把一部分指战员送到教导队培训，一部分干部下派到连队充实基层，把宣传队和华侨服务队上调到军部等。如此，满足了点验大员们的要求。

叶挺对国民党官场上的虚与委蛇、排场阔气之风，一向不以为然，不屑一顾。但是为了新四军，他还是强按厌恶，尽力应酬着罗卓英一伙，给足了他们面子，让他们觉得热情周到，体面恰当，一个个自我感觉良好。点验之事，总算应对过去。

点验过关，叶挺功劳大焉。按国民党“以枪定编”的规定，新四军集结之时，实实在在只有不足4000支枪，对外号称6000余枪。点验过后，新四军居然保住了万人以上编制，叶挺千辛万苦募集资金，一下购买、装备到部队的3600支驳克枪起了极大作用，等于保住了全军三分之一的编制。

点验虽然过关，但是叶挺与项英没有沾沾自喜，而是产生了更强的紧迫感。他们率领的新四军，是我们党目前领导的两大正规部队之一。部队的政治素质、官兵们对党的忠诚毋庸置疑，但是从军事上讲，无论从部队的形象观瞻、行动方式，到官兵的军事素养、适应能力，与一支现代化的正规部队及其担负的任务都还差距很大，都不能再与分散活动、各自为战的游击队同日而语。部队还保留着很严重的游击习气与习惯，随意性、随机性、随便化、自由化的现象比比皆是，军人形象不严谨不统一，军事管理不严格不周密，军事作风不严谨不严厉，军事素养不全面不适应等等。为了尽快适应马上面对战争任务，必须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整训。

作为主要军事首长，叶挺把主要精力与大多数时间用在了抓军事训练之上。他像当年训练独立团那样，既当首长，又当教官，从基础训练抓起，从严从律治军。一天到晚，从起床号吹响，到熄灯号休息；从部队着装、集合、列队、出操，到整理内务、军人礼典、军事纪律；从单兵教练到集体会操，从军事学习课堂，到军事演习阵地，人们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一点一滴教大家整理军容风纪，一招一式教大家军事技能，一条一款地教大家熟记军事规矩……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用尽了全部心思。

部队指战员多数是农民出身，多年的游击战争又使他们养成了原有的生活与行动方式，对正规部队严格规范甚至单调机械、重复枯燥的军事生活与管理形式很不适应，很不习惯，很不理解，很不接受。时间不久，各种各样的意见与牢骚纷纷出来了：队列练得再好，就能挡住鬼子的子弹？正步踢得再好，能把鬼子吓跑？跟鬼子拼起刺刀来，恨不得扒了光膀子，谁还顾得上风纪扣扣没扣？一吹熄灯号就得躺下睡觉，要是鬼子来偷袭，看谁还顾得上熄灯没熄灯……由于对基础军事管理的重要性不理解，许多人的意见又如同小孩子恻气一样幼稚可笑。

叶挺对这些习惯了游击作风的可爱的指战员们的意见甚至恻气，很体谅很理解，他没有像其他的国民党长官一样，动辄板起面孔来训斥一通，而是抓住我军指战员永不服输、不甘人后的进取心，对大家常常使用激将法。新四军部队的附近，就驻有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手下的一支部队。顾祝同在国民党中素以“仁慈带兵”出名，实际是纪律松懈，疏于管理。顾听部下汇报，叶挺天天在操场上亲自训练那些山沟里出来的游击队“土包子”，搞得热火朝天，有模有样，心中不免有点妒嫉，遂下令部队强化训练，与新四军“土包子”们比个高低。叶挺则每每指着国民党训练场，对指战员们大声说：“同志们，

看看那些国军的样子，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英雄军队，还能不如他们吗？我们能让他们看我们的笑话吗？”

军长一声问，部队齐呼应：“不能，坚决不能！”大家的自尊自强之心，一下被激发起来，训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倍增。

带领各路红军游击队出山的项英，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军事家，自然有更高的觉悟与深刻认识，懂得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与作风整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也深知，对这些红军战士们，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做样子给他们看。他率先垂范，一马当先，带头递了光头，打着绑腿，着装严整，天天跟着战斗部队出早操，练队列，风雨无阻，一丝不苟。自己做出样子，他又耐心地开导大家：“要把分散的游击队改造成统一集中的正规部队，必须要培养严谨的正规作风。没有统一的步伐与严谨的作风，能打胜仗吗？”

大家又是一片呼应：“不能！”红军游击队的“大当家”“总头领”项英都自觉积极刻苦地进行军事训练，大家便再没有什么意见与牢骚，也不再说些风凉话，个个争先恐后，意气风发，军事与作风训练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进行基本训练与作风整训的基础之上，针对日本侵略军的作战特点和华中敌后平原水网地区的作战地形，结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实战经验，新四军军部又要求并指导各部队进行了各项实用军事技术和战术训练。普遍开展了从单兵射击、投弹、刺杀到班的战术配合训练，学习划船、游泳技术和防空、防毒等知识，进行了打骑兵、打汽车、打坦克等训练。为提高各级指挥员的能力与水平，军部还组织大家学习研究伏击与反伏击、袭击与反袭击、攻打据点战法。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岩寺整训，通过短时期集中、严格的军事训练与作风整顿，使新四军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光彩熠熠，正所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更为把这支游击部队建设成强大的正规部队，胜利挺进敌后，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岩寺点验

也说庄陔兰

莒国风月

庄陔兰，字心如，号春亭，晚号春苔，原名庄阿兰，山东莒州（今莒南县）大店镇人。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庄家书香门第，诗书继世，庄陔兰天资聪明，他16岁考取童生，17岁中秀才入郡庠，27岁时乡试未中，次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拔贡，放乐安县训导。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乡试中举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三月，会试于河南贡院，在大清王朝的风雨飘摇中，庄陔兰中二甲第十四名进士，入翰林院为编修，诰封朝议大夫。

当时的正考官为吏部尚书政务处大臣张百熙，副考官为都察院左都御史陆润庠、吏部右侍郎戴鸿慈。

此次殿试共中进士273人，当时的状元叫作刘春霖。因没落的大清王朝在第二年下令废除科举，所以此科殿试的273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科进士。



庄陔兰和孔德成在孔府

庄亥兰榜上有名了，但他没能安心做官，接下来的岁月，他才真正开始了人生中的风雨历程。带着大清王朝最后的荣耀，庄亥兰于1906年由翰林院保送入日本法政大学法政专修科学习。在日留学期间的庄亥兰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有了接触，他吸收了新的思想，后来秘密的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经过两年学习，1908年庄亥兰回国，任山东法政学堂监督。在任期间，与师范学堂监督、同盟会员王墨仙以及夏继泉等，经常秘密集会，斥责清政府。1910年，庄亥兰任山东巡抚孙宝琦的秘书。

孙宝琦与袁世凯是亲家，孙宝琦的女儿嫁给了袁世凯儿子袁克齐，袁世凯一个女儿嫁给了孙宝琦的一个侄子。

孙宝琦的人品不怎么样，因为他反复无常，他曾密函孙中山“危险速逃”。他还曾于1907奏请清廷借机收回青岛主权，后来他还向德国收回了部分铁路路权，为时人所称颂。

但这人是个两面派，他一面向革命党示友好，一面又向朝廷表忠。

庄亥兰看透了孙宝琦的为人，想借孙宝琦干一出事业，他在等待时机。

不久，机会来了。

1911年，爆发了武昌起义，庄亥兰看准时机，和徐子鉴为首的革命人士与地方官僚士绅联合，逼迫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并断绝与清政府的关系。1911年11月7日，山东各界联合总会成立，庄亥兰任副会长。11月13日，山东终于宣布独立。这里所谓的“独立”并不是山东自立为国，而是与清政府脱离关系。

事情非常严重，大清政府很生气，要出兵山东，孙宝琦怕了。

迫于压力，11月底，山东取消独立，经此大变，孙宝琦心力交瘁，告病辞职。但庄亥兰因此名声更加大振。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庄亥兰当选为国民党山东支部理事。后因山东内部政府调整，济南都督府与烟台都督府合并，庄亥兰任都督府秘书长。

庄亥兰开始了正式在国民政府的职场生涯。1914年，庄亥兰就职于山东行政公署总务处，同时，因才华出众，他还兼任山东图书馆馆长。

三年以后，1918年，他被选为第二届国会参议院议员。

接下来，庄亥兰用行动证明了他是一位爱国人士。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次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宣布让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这让庄亥兰等爱国人士很不能接受。于是1919年4月26日，庄亥兰同山东籍的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两院议员20余人前往总统府，向总统府秘书许宝衡痛陈此事。主张直接索还青岛及铁路矿山，并废除中日新约。庄亥兰为首的参众议院人士致电欧洲和会，拒绝承认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虽然事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至少证明了他的这份爱国救国之心。1924年，庄亥兰被段祺瑞聘为国会商榷委员会委员。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国内局势更加动荡。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庄亥兰的救国之心受到了强烈的打击，他深感时局混乱，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可以说是心力交瘁，他选择了脱离政治，退隐江湖。这一年，庄亥兰54岁，已过知天命之年。庄亥兰抛下革命理想，来到了北京，住在北京宝善寺研习经史，后来，他又来到青岛崂山广善寺，两耳不闻窗外事，在寺庙里修读佛经、研习书法。这一住就是五六年。

1932年，庄亥兰回到故乡大店镇，隐居在自己的庄园里，过起了“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此时的庄亥兰已年过花甲。

庄亥兰归隐故乡的消息很快被世人所知，《临沂县志》编修组专程来大店请庄亥兰为县志作序。

1934年，当时莒县正策划编修县志，当得知庄陔兰回家的消息后，时任莒县县长的卢少泉亲临大店，邀请庄陔兰出任《重修莒志》总编纂。庄陔兰欣然应许。

当时聘请的编修人员还有李炳南、周召亭、庄符德、赵阿南等。

庄陔兰强调修志要有时代性，他说：“莒自春秋以来，以国名县，至今无改，与他县异；则其为志，当与他志异，至民国而为莒志；又当与前志异。然综述数异，而有一同，曰记实而已矣。修现代之方志，必具现代之眼光，适应现代之需要。”

庄陔兰是个讲究信誉、崇尚道德的学者，一旦应许，就倾力于修编之中。他主张志书务要求“实”，他说：“若征今而不实，人皆得正其失而纠其谬也，吾为此惧”。

可是要编纂完成这样一项浩繁的工程决非易事。上起周代，下断民国，历史跨越2000多年，可借鉴史料文字之缺乏，已令人生畏，更重要的是修编缺乏经费。

修编缺少经费，庄陔兰想到了润笔募款，卖字筹资。当时庄陔兰的书法是世人皆称道的，据传著名慈善家何宗莲病逝后，其纪念碑于1934年在济南中山公园落成，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撰写了碑文《何公传略》，并慕名请庄陔兰书写后镌刻在纪念碑上。庄陔兰订出润笔价格，将卖字所得用于编修刊印之资，一时登门求字者络绎不绝。他倾其精力，费时三载，这部堪称“集莒地方志之大成”的《重修莒志》终于编纂完稿。

这部77卷的鸿篇巨著，是研究莒文化和莒历史的重要文献，现在成为莒县和莒南县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重修莒志》编纂完成不久，1936年，庄陔兰应曲阜孔府之邀，任孔德成汉文教师，专教韵学和经书。

孔德成，生于1920年，是孔令贻的遗腹子。字玉汝，号达生，系孔子第七十七代嫡长孙，袭封三十二代衍圣公，后因民国不宜保留衍圣公称号，上书请辞，被国民政府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孔府是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号称“天下第一家”。为继承祖上的功德事业，历代衍圣公对子女教育极严。能被孔府选聘的塾师，非功底深厚、德高望重的学者大家莫属。能到孔府为师，也是许多人渴求，并引为荣尚的事情。

庄陔兰答应了孔府的邀请，但是提出了三个任教条件：一是不取酬金，孔家只需承担任教期间的衣食住行费用；二是自己不提请辞去，孔家不能辞退；三是想辞行时，孔家不能阻拦。

求贤若渴的孔府当即应许。那时小汽车很稀罕，庄陔兰第一次去任教那天，孔府专程派人用汽车来大店接庄陔兰。

同时在孔府任教的还有王毓华、吕金山等人。

庄陔兰不但教育有方，而且品德高尚，憎爱分明。在孔府任教期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1939年，日军侵占了大店。在一次作战中，驻大店的一名日本军官战死了。日军为装点门面，笼络人心，想参照中国人的做法，为死亡的军官举行葬礼，便派人请庄陔兰书写挽联。这个平日儒雅有度的庄翰林，一听此事便怒发冲冠，严辞拒绝：“日本侵略我国，屠杀国人，居然还让我写挽联，真是岂有此理！”“七七事变”后孔德成被国民政府接去重庆，受孔德成委托，王毓华与庄陔兰共同协助孔家照管孔府事务。王毓华与庄陔兰律己甚严，清正廉洁，孔府中文物古籍价值连城，他们一尘不染。

抗战胜利后，王毓华去南京孔德成的办事处，协助管理府务，1949年南京解放后王毓华回归山东故里，务农行医。1952年3月王毓华因脑溢血去世。



庄亥兰故居(莒南大店)

1945年日本投降后，孔德成随国民政府迁往南京，旅居上海。1947年3月，孔德成曾回曲阜祭扫林庙，1949年随国民政府去台湾，从此，孔德成终生再也没回孔府。庄亥兰在孔府一呆就是10年，直至去世，与孔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孔德成的姐姐孔德懋在《孔府内宅轶事》一书中，这样写道：“庄老师年近七十，是个翰林，经书和书法造诣很深……是客居孔府，不要薪俸，只是每天生活所需，由孔府开支算是招待，专教我们韵字和经书。”

1946年9月，庄亥兰病逝于孔府，享年74岁。

庄亥兰一生著述及书法作品无数，叹未成集，仅留《重修莒志》一书。

依照庄亥兰初到孔府时“我不提请辞去，不能辞退”的要求，有人提议将庄亥兰葬于孔林之中，但遭到孔姓族人的反对，因为孔林自古留下一条规矩，有五种人不得葬入孔林，即使贡献再大：

- 一、曾作奸犯科，受过牢狱之苦之人；
- 二、遁入空门之人；
- 三、早年夭折之人；
- 四、出嫁之孔家女；
- 五、与孔家女完婚之孔家女婿。

庄亥兰的墓地选择成了一时的难题，经过孔氏族人的商议，最终决定将庄亥兰葬于“孔府园林”。

所谓的孔府园林并不是孔林，而是孔府的“义地”，义地是指由私人或团体设置埋葬贫民的公共坟场。孔府为这片“义地”取名“孔府园林”。用来埋葬不能进入孔林的孔姓后人和在孔府供职的外姓人和家丁等。孔府为表达对庄亥兰的尊敬，在其墓前刻碑立石。惜因文革动乱，庄亥兰墓碑等物皆已不存。唯有黄土一堆在风吹雨打中默默地为这位昔日的翰林遮风挡雨。

王雅量传略(下)

王如良



费县苑上琴泉

四

王雅量留传后世的大量著述，集中收录于《长馨轩集》，其绝大部分是他向皇帝上疏的奏章，而其中多是反映解决百姓疾苦为民请命的内容。明末官场腐败，朝纲混乱。他心急如焚，既为大明基业不稳而担忧，又为百姓困苦而悲愤，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这些上疏既如实禀报了民众的困苦状况，又讲明了事态发展的危害程度，还提出相应对策。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冒着被革职处分甚至杀头的危险，反复上陈应近贤良远奸佞，应行仁政德政、修省自身，其言词极为恳切。

王雅量在东北期间，山东境内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和蝗灾，庄稼颗粒无收，饿死者无数，甚至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况，许多地方的灾民揭竿而起。王雅量火速上疏朝廷，建议速拨库银，派廉洁精干的官员到各省购粮，并用海运、河运、陆运等方法向山东运粮。他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采纳，随着大批粮食的运入，从而

拯救了山东人民，也稳定了山东局势。

王雅量在陕西任职时，发现当地土地瘠薄，赋税沉重，民不聊生，几乎人人面黄肌瘦，结伙成群的外出乞食逃荒者竟堵塞了各地的路口。农民起义、盗贼劫掠之事，几乎天天发生。王雅量由此联想到全国因连年灾荒，百姓无法生存，起义此起彼伏，严重影响全国稳定的形势，于是上疏朝廷，建议免征当年全部税银，并拨粮款抚恤全国各地灾区人民。

王雅量的这些上疏，体恤民情，关注民生，珍惜民力，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生产发展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王雅量秉承“廉生公，公生明，明生断”的为官之道。他始终把“廉”作为从政的座右铭，认为“廉”是“生公”“生明”“生断”的根。为官者只要“廉”，那么“公”“明”“威”“断”都会相继而生。

王雅量做到了为官清正廉洁，他任大理寺少卿时，冒着风险依法办案。他每次卸任归家省亲，均两袖清风。他在费县省亲期间，鲁南等地的白莲教徒发动了武装起义。义军攻城掠地连下鲁西南、鲁南多座城池。而山东守备极为空虚，费县官员无奈来到王雅量门下问计。王雅量义无反顾地挑起守城平变的重任。他一方面捐资招募精壮，把守城池要道，并亲披铠甲上城墙巡视；另一方面保荐在临沂病休的著名武将杨肇基担任山东总兵，率部迎战。他的举荐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杨不负众望，率部历数十战，终于平息了事变。

在这次平定白莲教起义过程中，王雅量功勋卓著。他首先散家财募勇守城，使费县无忧，从而保住了官军从沂州到兖州的后方补给线。其次是他上疏朝廷启用杨肇基就近募兵并统率全山东官军，从而迅速地剿灭白莲军，使山东免除了一场大战乱。但王雅量并不以有功者自居。他说：“杨公（肇基）功在社稷，天子已报之矣。而吾辈得保聚室家，仰谁之赐乎？”他倡议费县人为杨肇基修建生祠，以报其功德，并请临沂籍进士、后任三晋御史、山西巡按的李应期撰写碑文。王雅量还亲自为在平定白莲教徒战斗中立下战功的兖州副使徐从治撰写生祠碑记。李应期在其撰写的《保傅大将军杨公生祠碑记》中，在赞扬杨肇基功绩的同时，又用较大篇幅记述了王雅量的功劳。他说：一是王雅量当时在家守孝，既无平定白莲军之责任，又居斗大不可守之孤立城池，城外就是深山大谷，完全可以携带家眷进山藏避，而他却募壮勇誓死守城，并倾其所有犒赏军士，从而保住了费县城；二是他知人善荐，推举杨肇基担任山东总兵，就近募集乡勇作战，结果将白莲军一举剿灭，平定了明朝“二百六十年来未有之大变”。李应期最后在碑文中感叹道：这些功绩，王雅量归功于杨肇基和其他官员，使他们都得以显扬，而王雅量的公心尽忠、倾慕仁义，不分别人和自己，不分台前和幕后，一心一意只为国家，这是无法埋没的。

从历史角度看，白莲教起义是带有进步性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苛求王雅量的所作所为。王雅量精忠报国、毁家纾难的胆识和义举应该得到客观公允的肯定。

五

王雅量从辽东卸任回老家费县探亲，刚到家不久，即被委任为陕西巡按。同年底因母亲病危，他被获准回乡探视。在此期间，皇上发来圣旨，命他去路途遥远的岭南（广东、广西一带）任职。可是他因母亲病故，只好在家守阙三年。除服期满后补四川道监察御史，接任此职不久又代掌京畿道，负责北京京城驻地一带的军政执政监督。继而，王雅量又被提任京官，任太仆寺少卿，负责京师的马政事务。此后又调任大理寺少卿，掌管刑狱。当时，大理寺无正卿，皇帝命他以副职身份摄

印行使正卿的职权。大理寺是复审大案、要案的最高司法机关。刑部、都察院、东厂、诏狱的大案都要经过大理寺复审。大理寺复审的人犯，大部分是受魏忠贤及其同党罗列罪名而入狱的，这些人大都是维护朝廷政权的东林党人士。王雅量依照大明法律严格、谨慎办事，凡冤假错案都一一予以平反。可是此时朝中因阉党魏忠贤专权，大理寺的政务也非常难开展。

明朝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政治腐败，吏治黑暗，社会动荡。世宗嘉靖皇帝崇信道教，长期不理朝政。神宗万历皇帝吸食鸦片成瘾。熹宗天启皇帝深居宫中以做木匠活为乐。思宗崇祯皇帝比这些人好一些，但明朝的崩溃已无可挽回了。

当时，东林党虽代表了正义的一方，但由于东林党指控西宫郑贵妃以及阉党一伙阴谋篡夺政权，而受到魏忠贤的陷害。

王雅量面对这些遭诬谄的所谓东林党“罪人”，非常痛心。正义感驱使他决不屈服于权势，以大明法律条文为依据与之斗争，从而保护了一批主张正义的官员，可是也触怒了当时手握重权的魏忠贤及其党羽，他在大理寺已无法再干下去，于是东林党人士、吏部尚书赵南星、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龙举荐他为通政司卿。

自天启四年（1624年），东林党杨涟弹劾魏忠贤24大罪状。魏忠贤反诬杨涟接受辽东将领杨镐、熊廷弼贿赂，被下狱处死；并假传圣旨，陆续将东林党人及朝中六部九卿的要职官员，如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庭等几十人罢官，朝中主持正义的官员几乎为之一空。王雅量自然也不例外，于天启五年冬也随着这些人回乡了。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十三日，熹宗皇帝朱由校驾崩。17岁的信王朱由检即皇帝位，改元崇祯，是谓思宗。皇权的更替使魏忠贤在朝中的地位日趋衰落。同年十一月初四，思宗命令兵部将魏忠贤押解回京，交三法司严审定罪。魏忠贤自知自己作恶多端，回京后绝无生路，即与干儿子李朝钦同时吊死在阜城县新店镇的一家旅店，明朝末期舞弄朝纲多年的奸阉魏忠贤就这样给他的生命划上了句号。魏忠贤一死，其同党及朝中奸阉势力彻底崩溃。

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皇帝指示给遭陷害被赶出朝廷的20多名官员恢复官位。王雅量虽已63岁，仍再次被起用，任光禄寺卿，专门负责接待外国宾客礼品收授和管理皇宫内财物购售等事项。此时的明朝皇室，糜费已经达到非常惊人的地步，自万历到天启几代皇帝吃喝玩乐，挥霍无度。随着宫廷生活侈糜，宦官和匠役数量已激增至万多人。1601年，光禄寺竟因为库存已空，为供应皇帝膳食，还不得不向户部借银垫支。

王雅量谨慎供职，严以律己，上任就带头捐银100两送兵部，表示对边关军事的支持。他规定一切日用祭祀干肉果品，当日用完后立刻收回库内，口说无凭，凭证件收入。仅此一项就为宫廷节省开支折合白银2500多两，还偿还了前任官长所欠白银。在被人认为有大用之时，他却淡泊仕进，急流勇退。崇祯四年冬王雅量上疏皇帝，以年老力衰不堪驰驱为由，请求退休，朝廷不准辞。到崇祯五年他再次奏陈衷情，言辞恳切，患病属实，朝廷见实在挽留不住，只得批准王雅量回籍调理。

六

王雅量一生多才多艺，重视文教培养人才，致力经史著作颇丰，在家丁忧和致仕回乡期间，他主持重修了县学明伦堂、县学宫。原来破旧而濒于坍塌的教学之所，经他倡导募资，修葺一新。其办学精神一直为乡人所传颂。



费县苑上天镜泉

王雅量在为官之暇竭力攻研经史，考察国家旧闻遗事，兼及天文、地理、医卜、星象之术。他留给后人的著述颇多，有《长馨轩集》21卷及大批散布在各种册典上的诗文。

王雅量立身树德，孝悌为先，仗义救友。为官几十年从不带家眷，在忠孝不能两全时，他留下妻儿侍奉双亲。在父丧、妻亡，仅寡母一人时，他屡上《乞养亲疏》请求回家伺候母亲，字里行间事母心切之情溢于言表。

王雅量对朋友，敢于仗义执言，从来不顾个人利益。刘光复是他在京的同僚，因直言陈荐而激怒了万历皇帝。当时王雅量正巡抚辽东，他在获悉此消息后，毫不迟疑地上疏陈情：刘光复上有八十老母，在家等待他伺候，虽上疏言辞不妥，不致获罪，请皇上网开一面，放其回家侍母致孝。终获皇帝首肯。

回乡后，他督促子孙读书种地，过着农家生活。每年提前交纳钱粮，不使官府为难，也从不到县衙去惊动县司官。回乡第二年，关门谢客，不久，又患上疟疾，他自觉身体不佳，开始准备后事。崇祯六年八月十九日，王雅量去世，终年68岁。

王雅量一生，为学为官，忠靖孝友，虽官居三品，却衣唯布帛，食无兼膳，几十年如一日，赢得朝廷和民众的赞美。

珍贵的“活化石”

——胡怀梅与她讲述的民间故事

靖一民



1985年冬天，我回到自己的故乡——临沭县白旄乡柳庄村采风。在乡电影管理站工作的靖美谱告诉我，乡驻地有一位名叫胡怀梅的老太太能讲很多故事，是四乡闻名的“故事篓子”。于是，我便与靖美谱一同到西白旄村胡怀梅家拜访。但好事多磨，胡怀梅的家门紧闭，我们没能见到这位老人。村里人告诉我们，胡怀梅不仅会讲很多故事，而且还是小有名气的“土先生”，她经常用土方给乡亲们治病，且治愈率很高。根据村里人提供的线索，我们骑着自行车跑了几十里路，找了数个村庄，最后才在一户农家找到了她。

胡怀梅的身材不高，那饱经风霜的身体显得有些单薄，但精神极好。她口直心快，待人热情，见了陌生人自来熟。当她了解到我们的来意后，很爽快地说：“我别的不会，就是会拉呱（当地人习惯称讲故事为“拉呱”）。说吧，想听什么样的？”我让她随便讲，谁知她一口气讲了十几则故事，仍意犹未尽。我知道，我遇到了一位少见的故事讲述家。

胡怀梅的人生道路十分坎坷。1915年，她出生于临沭县郑山镇轩庄子村的一户贫苦农家。她的曾祖父虽是前清举人，但到了她祖父这一代家业就已

衰败，父亲和叔父分家时，仅分得8分地。因为仅靠种地无法养活一家老小，胡怀梅的父亲只好在农忙时到地主家当雇工，农闲时则做木玩具走街串巷叫卖，以求养家糊口。胡怀梅生长在这样的贫穷农家，自然不会有什么“金色的童年”，她的幼年基本上是在贫困饥饿、兵荒马乱中挣扎着度过的。据胡怀梅老人自己介绍，她虽然是一个贫苦农家的女儿，但幼时的她却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有一次，父亲外出卖木玩具去了，村里突然来了土匪，母亲听见枪响，抱着弟弟、妹妹迅速躲进了门外的柴垛里，她没来得及躲藏，被土匪堵在了屋里。两个土匪进屋后，见只有一个小姑娘在家，就想把屋里仅有的半升麦子拿走。胡怀梅机智地说：“那半升麦子是给人家留的。”土匪问给谁留的？她就说是两个大人，都拿着手枪。土匪听说都拿着手枪，怕遇着当官的，就乖乖放下麦子走了。母亲从门外进来，抱着胡怀梅就哭，她没想到女儿这么聪明。

胡怀梅21岁时嫁到本县东白旄村，婚后六年没有生育。丈夫在医疗事故中死去。没过多久，土匪又深夜闯入她家，把家里的粮食和衣服等物抢劫一空，又打残了她的公爹。在那些以泪洗面的日子里，时年27岁的胡怀梅虽有改嫁的愿望，可她不忍心丢下残废的老人，自己也深受封建礼教束缚，一时没有勇气改嫁，只好忍痛过着凄苦的寡居生活。第二年，为了寻求精神寄托，胡怀梅加入了圣贤道。也就是在那年秋天，八路军来到村里宣传抗日救国，胡怀梅提高觉悟脱离了圣贤道，被乡亲们选为村妇救会长。从此，她决心跟着共产党走。

1955年，胡怀梅改嫁到西白旄村，与一位名叫刘宝祥的人结了婚。刘宝祥当时是41岁，家里很穷，结婚时还是借了别人的屋做的新房。可夫妻俩互相体贴、同病相怜，日子过得挺顺心。由于婚后不能生育，老两口先在本村抱了个女孩当闺女，后又收养了一个讨饭的青年做儿子。这之后，每逢过年过节，胡怀梅都会买些稀罕东西，让儿子带着回安徽老家看望生身父母。有人劝她说：“你心眼太直了，这样下去，儿子会跑的。”胡怀梅却说：“就是喂条小狗，日子多了还得回去认认门呀，别说是个儿子。”村里人都夸她心眼好，懂礼。胡怀梅对养子养女好，养子养女也像亲生儿女那样孝敬她，在胡怀梅的晚年，她和老伴刘宝祥全依靠这对儿女赡



胡怀梅在给乡亲们讲故事

养。只是她的老伴没享几天福，就于1984年病故了。

胡怀梅的长辈虽然没有财产传给后人，但却通过讲述民间故事，把最宝贵的民间精神财富传承给了胡怀梅。胡怀梅的祖父、父亲、母亲都会讲故事，不论是谁有时间，都愿意讲故事给胡怀梅听。幼时的胡怀梅记忆力惊人，当天听大人讲的，不论长短，第二天都能转述给小伙伴们听。胡怀梅的父亲曾风趣地说：“谁说俺家的坟脉不好，不是也出了个拉呱的（讲故事）嘛！”胡怀梅的堂祖父是个老秀才，在镇里开药铺。幼时的胡怀梅经常到铺子去，学针灸，用中草药给人治病，听堂祖父讲故事。胡怀梅18岁那年，为了躲土匪，她住进了姥姥家，认识了表叔家雇的一位长工。这位长工会讲故事，每天晚上胡怀梅都到表叔家，一边剥花生皮，一边听长工讲故事，听了整整一个冬天。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一个连在胡怀梅的村子里驻守了很久，住在胡怀梅家的一位炊事员是个故事篓子，胡怀梅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故事。除此之外，胡怀梅还喜欢听书看戏，只要四周村子里有说书唱戏的，她从不落空。胡怀梅虽然没有文化，但她的记忆力超众，只要是看过的戏剧、听过的段子，她都能牢记下来，并原原本本地讲给别人听。

胡怀梅是一位心灵手巧、多才多艺的农村妇女，许多事情一看就明白，一学就会。她不但禀承了父亲那种豁达开朗的性格，而且喜欢串亲访友、广泛社交，在最困难的时候，就是乞讨要饭，也没有垂头丧气过。她性格随和，有副热心肠，村里每每有人娶亲嫁女，她都会帮人家绣花、剪窗纸、描红画绿；谁家需要做衣服了，她又会帮忙裁剪、缝纫，并保证穿在身上舒展合体；大人小孩有个头疼脑热的，她就用学会的医术给病人治疗，针灸、拔火罐，再配以自己熬制的中草药，疗效还真不错。胡怀梅还好管闲事，张家婆媳不和，听她讲几个故事关系就得到改善；李家两口子打架，经她调解说合，从此就过得和睦美满。几十年来，胡怀梅的足迹遍及临沭县的许多村庄。正因胡怀梅结交广泛，她听到的故事也就比一般人多，加之她记忆力非凡，伴随着故事的积累，她成为一位四乡闻名的“故事篓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胡怀梅讲述的故事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些故事不仅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朴素情感和对人生的真切感受，而且为研究沂蒙地区的历史、文化、语言、民俗等课题提供了一份极其珍贵的资料。

从笔者已整理出的故事可以看出，胡怀梅讲述的故事大体可以分为五种类型：一是讲述传统生活内容的故事居多，有反映父母、兄弟、夫妻、婆媳关系的，有反映长工与地主、穷人与财主、百姓与官府之间矛盾斗争的，也有巧女、机智人物、傻女婿故事。这些故事贴近生活，融入了普通百姓的道德准则和对社会与人生的深刻理解，是当地群众百听不厌的故事。二是帝王将相、清官、文人传说故事也不少，由于胡怀梅的祖上是读书人，她幼时便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人物故事，因此在她讲述的故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讲周文王、孔子、甘罗、欧阳修、康熙、乾隆等历史名人和帝王故事的。这些故事构思巧妙、内容风趣，所涉及的人物都是在民间有一定知名度的，“故事迷”们自然也乐意知道他们的轶闻趣事。三是民间案情故事占了一定的比例，如《让妻》《巧破偷奸案》《替死》等。胡怀梅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漫长的岁月里，她时常能听到一些离奇的案情。由于这些民间案情大都是一波三折，讲述起来深受“故事迷”们欢迎，胡怀梅自然就愿意讲述。只是，

从已录音的故事看，这类故事所占比例很小。四是有大量的动植物故事、神话故事和带有神话色彩的神性故事以及怪孩子故事，如《黑狗戴乌纱》《生龟拦轿》《蛤蟆儿》《亚拉射月》等，在胡怀梅讲述的故事中都属精品。特别是她讲述的《孟姜女献皇袍》的故事，长达万余字，不仅情节曲折复杂、语言简练准确，而且唱词生动感人，足见胡怀梅的记忆力和口语表达能力有多强。五是爱情故事，这可能与她的爱情经历不美满有关。她年轻时，曾与那位会讲故事的八路军的炊事员有过一段恋情，可惜那个她一生中唯一深爱过的男人随军南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或许是为了纪念那短暂的恋情，胡怀梅不但一生都在讲述着从那位炊事员那儿学来的故事，而且还格外喜欢讲爱情故事。她所讲述的爱情故事，很少铺述缠绵的情节，故事中年轻女性的性格大都很刚强，男主人翁往往借助她们的支持和鼓励，才在困境和忧患中振作起来，最后得以功成名就。这大概与胡怀梅的自身经历有关，也正体现出了故事家的个人因素和风格。

由于自身经历和受父母的影响，胡怀梅讲述的故事多是同情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社会中的弱者和被迫害者的，她把“善有善报、恶有恶果”作为故事的核心和生活真理来传播，许多故事中都流露出对地主老财、地痞恶霸、官府显贵们的蔑视和无比痛恨。胡怀梅常对人说：“为男为女在世间，良心行为要当先；为人不懂世间礼，枉在人世走一番。”

胡怀梅在给乡亲们讲述故事时，常会融入自己的观点，用三言两语表达她对故事的看法和评价，并通过议论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如在讲述《姜素贞钓鱼》时，讲到姜素贞大冬天在江沿上咬下左臂肉作诱饵，钓鱼孝敬病中婆母，感动了南极仙翁下凡来成全了她。胡怀梅就使用了揶揄的插语。她说：“拉呱的没办法，就把神仙拉。”在胡怀梅讲述的许多故事中，每当主人公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和矛盾时，就会有仙神鬼魂来搭救，这种表现手法使得她讲述的故事有着某种神秘感，更容易吸引听众。

胡怀梅到底能讲述多少则民间故事呢？我没有认真统计过。但1985年冬天，我请她连续讲述了10天，录制了300余则故事，她似乎还有许多故事要讲。由此可知，她确实是一位记忆力超众的“故事篓子”。特别让人称赞的是，她讲述的故事题材广泛、类型齐全，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故事情节，都有极高的研究和欣赏价值。我从中挑选出五篇整理后，交给了《民间文学》杂志。该杂志对这组稿件给予了高度重视，不仅将五篇故事全部安排在1986年第6期上刊出，而且还配发了胡怀梅的多幅照片和我的采风照，并同期刊发了该杂志社的编辑华积庆先生撰写的长篇评论。与此同时，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也从已整理出的胡怀梅讲述的故事中挑选出62篇，编入了《四老人故事集》一书。

由于胡怀梅讲述的故事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这些稿件刊印后，立即引起国内外民间文学界的关注。世界著名学者、美籍华人丁乃通教授从美国致函《民间文学》杂志社，对胡怀梅讲述的故事给予高度评价，并索要有关资料想介入研究；国内民间文学界的一些学者、专家也纷纷撰写论文，从民俗学、语言学、社会学等角度，对胡怀梅讲述的故事进行研究。1987年7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与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在临沂召全了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对胡怀梅讲述的故事进行了深层次研讨，并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此同时，山东电视台、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大众日报》《齐鲁晚报》《走向世界》等10余家媒体，先后报道了胡怀梅的事迹。2011年，我又整理出她讲述的70篇故事，以《口头传统新档案》为书名，交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出版后得到了民间文学界的高度评价，并获得山东省泰山文艺奖（政府奖）。



为表彰胡怀梅对民间文学事业的贡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破格吸收她为会员，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她“故事讲述家”荣誉称号。

三

胡怀梅晚年的时候，不论是春夏秋冬，她的家里都是永不寂寞的“俱乐部”，有的人连电视都不看，跑来听胡怀梅讲故事，多时竟达近百人。夏天院内的石碾，冬天屋内的炕头，成了她说故事的“讲台”，她或往石碾旁一坐，或在炕头上一盘，就开始了如痴如醉的故事之旅，常常是讲到深夜，大家还不愿离去。在胡怀梅的影响下，村里还出了几位能讲几十则故事的老人，如村民刘稳祥，不但从胡怀梅那里学会了数十则故事，而且还经常与胡怀梅对唱表演，为胡怀梅的故事添彩不少。我曾想录制她与刘稳祥的对唱表演，可没想到2006年3月，她却因病溘然离世（享年91岁）。

胡怀梅虽然离开我们许多年了，但她所讲述的那些故事，就像一枚枚美丽的“活化石”，初看没有什么稀奇的，无非是些很粗糙的民间故事，但当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时就会发现，她的故事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些故事不仅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朴素情感和对人生的真切感受，而且为研究沂蒙地区的历史、文化、语言、民俗等课题提供了一份重要的资料。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岁月的嬗变，胡怀梅所讲述的故事会愈来愈显出其珍贵的价值！

丹青为人民，笔墨随时代 (二)

——记著名画家皮之先

刘瑞轩

上世纪60年代初，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决定从中央机关派一万人去支援老少边穷地区，周总理在首都万人大会上发出号召：“你们要为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做出贡献！”1961年夏天，皮之先响应号召，携带夫人孙允正和作家王火全家一起，来到革命老区临沂。从此在这座历史悠久、富有革命传统的老城扎下了根。

最初，之先在临沂师范当美术老师（任艺体组组长）。除教素描外，之先侧重教西画，王小古侧重教国画。这两位画家各有所长，互相尊重。就在条件简陋、买不到宣纸和油画颜料的情况下，他们把自己对艺术的理解、感悟，把多年磨炼的技巧无私传授给学生。在师范任教的十多年，为临沂地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美术人才，学生遍及全区各个部门（少数分到外地区），有的走上中、小学美术课堂，有的到文化馆从事专业美术工作，出类拔萃者成为省内外知名画家。

1975年，之先被调到临沂地区艺术馆任副馆长，负责全地区13个县的美



术辅导工作。艺术馆常年开办培训班、学习班，每期三个月，每次几十人。学员来自工厂、农村、矿区、商业系统，由于学员基础参差不齐，他因人而异，进行具体辅导。亲自为学员讲构图、色彩及透视等知识，经常带学员到野外写生，指导学员如何观察生活，如何将素材加工成作品，使学生在短时间内提高水平。另外，各县的美术骨干，搞创作时莫不请他指导、帮助。他们的作品有的选到省里展览，或者由出版社发表，其成果都凝聚着之先的心血。

之先深感专靠艺术馆培养人才、推动创作是不够的。1984年，在他担任文化局副局长时，他又倡导成立了全省第一家地区级画院——临沂画院，自任院长，又吸收了几位有绘画才能的青年才俊为专职画家。画院由开始20来人很快发展到100多人。1986年，他又倡导并积极活动，成立了临沂地区书法家协会，他被选为主席，张寿民、岳修五任副主席。他利用自己的威望，请舒同、武中奇、王学仲、李少言和师母廖静文担任画院和书协的名誉院长和主席，并请崔子范（山东莱阳人，曾任北京画院书记）、李少言（临沂人，任四川美协主席）来临沂讲学和展览。这对于促进临沂地区书画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之先任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期间，分工抓文物和群众文化（美术）工作，为建设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建王羲之故居和孟良崮碑廊，为考察摸清全地区的旅游资源以及搞书法大赛等活动，立下汗马功劳。

1972年4月，银雀山竹简从汉墓出土，引起了中外考古界的重视，被认为是20世纪我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由于谷牧副总理的关照和督促，从1981年2月开始，由临沂地区拨款，由擅长古建筑的汪建中设计，地区建筑公司（曲阜搞古建筑的人员协助）承建，在汉墓遗址上建设“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共用八年时间，至1989年10月落成。馆内设有“银雀山汉墓厅”和“竹简陈列厅”两个展厅。

当1984年之先到文化局上任时，正值博物馆将要布展之时。出土的近5000片竹简均已送北京故宫博物院，临沂只留下一些复制品。怎样布置好两个展厅呢？馆长刘大田感到很为难。临沂只有综合性博物馆，对于这样遗址式专题博物馆怎样布置，谁也没有经验。于是之先带领刘大田馆长和雕塑家左耀国、搞版面设计的姜书璞等人去北京，到故宫博物院请教（顺便请启功先生题写馆名）。杨伯达院长很热情，为他们召集了故宫的五位专家进行论证，出谋划策，提出一个供参考的方案。之先和刘大田又请中国军事博物馆陈列部郭部长和兵器馆的王辉强二位专家，多次来临沂，现场指导布展。文化局的陈希法主任根据专家的意见和馆的实际情况，拟定了实施方案和经费预算。为了搞得更精美，之先又请剧团的尹传义帮助设计版面，请搞道具的孙兴森（曾为电视剧《宋江》做道具）复制古兵器。

布置好的展厅，基本做到了实用与审美的完美结合。即以“竹简陈列厅”为例，一进门是左耀国的创作孙臧雕像，背景是用竹胶板做的放大的竹简。四面墙上的版面，用文字和图片介绍“孙子兵法”和“孙臧兵法”。这两部分各有孙武和孙臧雕像。其间还穿插进著名人物画家相起久作的五幅国画：《桂陵之战》《魏与赵攻韩》《美姬演阵》《驰逐重射》《孙臧见威王》等。

博物馆占地15亩，南北两座展厅均为古典宫廷式建筑，南北由长廊连接，院中还有水池、凉亭，纵目看去，很像北方古典园林。唯一缺陷是没有奇石点缀。1986年，之先亲力亲为，与刘大田等一起去费县，在雕刻和经销石头的韩书凡的带领下，跑四五个乡镇，采购了十几块奇石，放在博物馆院内，使此馆锦上添花。

1989年开馆后，参观者络绎不绝，不仅有众多的国内参观者，连日本、韩国、美国（西点军校）等国的游客也来观光，每年接待游客达三万人次。

1984年春，为纪念孟良崮战役胜利40周年，之先以文化局的名义向地区领导建



议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建一碑廊，得到领导同意。春节后，之先便由陈希法陪同，一起去北京。他们一一登门拜访在京的书画家和参加过孟良崮战役的老干部、老将军（或家属），征集题词。之先负责征集书画家的题词，陈希法负责征集老干部、老将军的题词。经过一个多月的四处奔波、积极活动，征集到的老干部的题词有：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的、粟裕夫人楚青的、谷牧的、迟浩田的等；书画家的题词有：舒同、启功、李铎、崔子范、王遐举、廖静文、吴作人、董寿平、赵朴初、黄均、孙轶青、刘炳森等人的。

皮之先以全国人大和省人大代表的名义多次在全国、全省人大代表会上写提案，建议修复王羲之故居，把临沂建成书法城，之先还请专家来临沂考察。这引起了市政府的重视，1989年，市政府决定开始修复王羲之故居。故居的碑廊也需要名家题字，皮之先进京开会，顺便为故居碑廊征集作品，可谓一举两得。

征集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请启功先生题词，开始不得其门而入。之先请故宫博物院院长杨伯达引荐，才得以进门。启功得知来意后说：“给书圣故居题词，那不是班门弄斧吗，我担当不起。”经再三恳求，启功答应让他考虑一下，一周后去取。以后拿到的便是四尺宣写的“我今执笔也题碑，鲁班门前弄大斧”那首绝句。之先二人想尽千方百计，共征集到几十件作品。以后，又到南京征集到武中奇、江渭清、萧娴、陈大羽的题字，到天津征集到王学仲的题字等。

修复扩建的王羲之故居，百米碑廊是重要内容，文化局收集的题词，作为第一批镌刻上石，最引游客注目。

1987年3月，省民政厅拨款40万元，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广场建碑廊，东边为老干部碑廊，西边为书画家碑廊。

1985年4月，临沂地委、行署按省里指示，为了更好地开发土地资源，要对本地区的国土资源进行调查。因为当时尚无旅游局，调查旅游资源的任务便落到文化局的头上。皮之先便按照上级的部署，于1986年行动起来。他在徐敏生、左耀国、刘大田等人陪同下，坐着车，对十几个县的名胜景点一一进行考察。

他们翻山越岭，涉水穿林，小车颠簸在崎岖的山路上，不仅十分辛苦，也冒着很大的危险。有时车爬不动了，年近花甲的之先便下来和大家一起推车；有的陡崖攀不上去，别人连拉带推，把之先送上去。在幽深的溶洞里，上有碰头的钟乳石，下有深浅莫测的水流，为了弄清洞里情况，他们摸黑也要向里钻。

经过两年的艰辛奔波，行程上万里，他们考察的名胜景点有：

蒙阴：仙人洞、杏山溶洞、鲁王台等。

沂源：沂源溶洞、猿人洞、织女洞、牛郎庙。

沂水：四门洞、卧佛山佛祖洞、地下大峡谷。

沂南：诸葛亮故里（砖埠）、北寨汉墓等。

费县：许家崖风景区、塔山、奇石等。

平邑：东蒙胜境、天宝梨乡（朝阳洞、赵庄溶洞等）

莒县：浮来山、定林寺等。

……

考察的结果由徐敏生撰写成文，于1988年收入《临沂地区国土资源规划》一书。

为纪念书圣王羲之诞辰1687年，弘扬民族书画艺术，1987年由文化局呈文给地区领导，倡议举办“书圣杯国际书法大赛”和“王羲之故里国际书画邀请展”，得到领导同意。皮之先和另三位领导同志（王任之、刘兴武、谷祖成）组成组委会，并亲自担任办公室主任。征稿从1987年开始，除登报、发征稿信外，又派外联组数



人到北京、上海及江浙一带，登门请名家赐稿。至1989年底，据书法组负责人惠玉昆先生统计，共收到大奖赛作品两万件，书画邀请展作品800件。不仅有国内作品，也有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菲律宾、比利时等国作品，不仅有大陆作品，还有台湾作品。

1990年5月9日，“大奖赛”的获奖作品和“书画邀请展”的入选作品在临沂展览馆正式展出。开幕式隆重而热烈，出席的不仅有临沂地区的领导、文化局、书协、画院的领导，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书画家廖静文、王学仲、尉天池、沈定庵、江文湛等人。日本书道代表团不仅参加了开幕式，还与中国书法家进行了书艺交流。一个地区级的文化部门以自己的人力、财力（自筹经费），能搞出空前大规模的、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展赛，这在全国也罕见。

在艺术馆和文化局繁忙的领导工作之余，之先见缝插针，积极从事美术创作。当时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他响应党的号召，为宣传好厉家寨、王家坊前、高家柳沟这三个毛主席批示的农业先进典型，他与车天德（1936年生，青岛人，当时在临沂地区艺术馆任创作员，常与皮之先合作）等画友多次前往莒南体验生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先进的人物和事迹为题材，创作出一批优秀的画作，如连环画《厉家寨》、国画《沂蒙山上女石匠》《炉火正旺》等。

之先热爱沂蒙山区的山山水水，这里的佳山胜水赋予他艺术的灵感，激起他创作欲望，他创作出一系列讴歌沂蒙山的作品，如《沂水万丈泉》《沂蒙山区好地方》《沂蒙凯歌》四幅组画等。

1975年，为了宣传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精神，之先和车天德、于太昌（1932年生，江苏徐州人，山东省美术馆美术师）等人奔赴淮河流域，从山东到安徽蚌埠、梅山水库、响洪甸水库、淝史杭灌区写生半年，创作出大型画册《淮河》，反映了治理淮河的宏伟业绩，描绘了淮河沿岸的旖旎风光。从这些画中既可看出青绿山水的传统笔墨，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淮河》画册出版后，不少报刊发文，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山水画反映现实生活的可喜成果。

（感谢陈希法、徐敏生、左耀国等同志提供材料）

抗战旧址之

青驼山东战工会成立旧址

国 英



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在今沂南县青驼镇青驼东村，中共山东分局领导组织召开了山东抗战史上著名的“青驼联合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山东各界人民代表300余名。会议选举产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最高行政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后改为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山东省人民政府），最高民意机关临时参议会，选举了山东出席国民大会的代表，同时成立了山东省总动员委员会，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会，山东省工、农、青、妇、文各种救国总会。张经武、李澄之、罗舜初等23人当选为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委员，黎玉为首席代表。郭洪涛、李澄之、李竹如等17人为参议会驻会委员，范明枢为议长，马保三、刘民生为副议长。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即设在青驼寺。大会期间，日本侵略军进行“扫荡”，古庙、阵亡烈士纪念碑等皆被敌人毁掉。当年旧物仅存一株银杏树。

1977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该旧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0年，山东省政府为纪念战工会（简称山东战工会）成立五十周年，对旧址进行重修，建立了山东战工会纪念馆，由徐向前元帅题名的“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创建纪念碑”耸立院中，与仅存的一棵古银杏树交相辉映。

何万祥：沂蒙山抗战的旗帜

高雷

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阅兵仪式。10个徒步方队起码有6个方队亮出了沂蒙山抗战的旗帜。在60面功勋荣誉旗帜中，可以确认的有9面旗帜的根在沂蒙，她们分别是：郑城战斗模范连（滨海军区六团八连）、何万祥连（滨海军区六团二连）、青口十八勇士（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六团一连）、钢八连（滨海军区四团八连）、演马庄战斗英雄连（滨海军区海陵独立团二连）、刺杀优胜连（鲁中军区一团五连）、铁的堡垒（一一五师教导一旅三团二连）、功劳排（山东纵队一旅四团四连三排）、青州连（鲁中军区十二团八连）。至于参加过沂蒙抗战的功勋单位旗帜那就更多了，像梁山战斗英雄连（一一五师特务营十连）、任常伦连（胶东军区十四团五连）等等。对它们，我们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说陌生，“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譬如那何万祥连，谁是何万祥呢？

——题记



何万祥不大爱在同志们面前谈自己的经历，有几个红军时期的老战士只是模糊地记得，1931年在红二十五军里，见过这样一个人，当兵是为了填饱肚子，他是穷苦人家出身，老家在甘肃省宁县。他原本姓朱，名字不知叫什么，参军后家里人经常到部队打扰他，他生气了：“老子革命了，哪里有这么啰嗦的！”他请求党代表给他改了名字，从此“何万祥”就叫开了。这年，他只有16岁，站队站在排尾，打仗却总是冲在前头，喊都喊不住。

1936年2月，何万祥所在部队东渡黄河东征。他主动报名参加突击队，突破天险后。他被授予“渡河英雄”。

全国抗战爆发后，何万祥所在部队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何万祥被编入陈（黄）支队——一一五师独立支队。到达晋西南抗日战场后，八路军配合友军作战，何万祥所在连队受命同日军争夺山头。敌人的炮火封锁了我

军前进的道路，而敌人已经到了半山腰，形势十分危急！这时只听我军的队伍中有人大喊了一声：“走啊！”一个粗壮的小矮个儿，腰里插了一圈手榴弹，提着一把驳壳枪，带着一个班跳出阵地，冒着敌人子弹打起的灰土，旋风样地卷上山顶。接着，响了一排手榴弹，敌人淌水一样地滚下了山……。

大家简直看呆了，有的人好像忘记是在战场上，从隐蔽地站直了身子看着他们。

下来以后，大家争着看他：黑黑的脸，尖尖的下巴，两条微翘的粗眉毛，一双容易在紧急的时候瞪圆的大眼睛，那身板走起路来浑身是风，他一直走到在操场里。当着大家的面，他把一束手榴弹弦往地下一摔：“嘿！看他敢不给老子滚下去！”有的人认出他就叫何万祥——何万祥就是这么个人。虽然，没人讲过他更多的历史故事，但近几年来，他一直以这股劲战斗着，生活着。

1940年11月，何万祥在——五师教导二旅六团二连当连长。这年12月，何万祥随部队来到山东滨海根据地。这一带，人民经常遭受日伪军的抢掠，生活非常艰难，部队天天吃地瓜干。眼看春节就要到了，侦察员跑来报告：日本鬼子抢了大批肥猪，在乔町集中了五六百头，准备第二天从阿湖车站装火车运走。乔町，是陇海路北的一个小村庄，驻有一个翻译官和20多个伪军。村子当中十字街口有一个三层楼高的大炮楼，伪军们据守在炮楼里。嘴边的肥肉岂能让他溜了，团首长决定派何万祥带领二连去打掉炮楼，把肥猪抢回来给部队和老乡过个好年。夜黑得很，何万祥连队士气高涨跑步赶到乔町。战士们靠近据点围墙搭人梯就跳了进去。汉奸们做梦也没想到八路军会来借年，惊恐之余，他们把一颗照明弹打上天空，这是伪军给阿湖据点的日军发出的求援信号。何万祥一面布置火力压制炮楼上的敌人，一边组织战士登木梯爬到炮楼两个枪眼之间利用死角喊话。

炮楼里的伪军负隅顽抗，拖延时间，像是等阿湖鬼子赶来增援。何万祥火了，拔出腰间的手榴弹，顺枪眼向炮楼里接连塞进几颗。翻译官被炸死，几个伪军被炸伤，其余的敌人乖乖地缴枪投降。

何万祥带领战士们冲进去，收缴了敌人的武器，赶着肥猪、押着俘虏向根据地撤去。前后不到20分钟，便结束了这场战斗。阿湖的鬼子赶到乔町时，何万祥他们早已离去。鬼子是人财两空，眼前留下了冒着浓烟的炮楼废墟，他们胡乱地放了一阵枪，悻悻离去。

二

何万祥作战，干净利索快。在战场上，他浑身充满了英勇的突击力量。他指挥连队作战，十回总有九回亲自带领突击队，攻克赣榆城的突击，就是很有名的一次。1943年11月为了配合鲁中和渤海地区的反“扫荡”斗争，粉碎敌人可能调转兵力向滨海“扫荡”“蚕食”的企图，山东军区命令八路军——五师教导二旅和滨海军区先发制人，发起赣榆战役。何万祥时任一——五师教二旅六团一营二连连长。19日晚，攻打赣榆城的主攻任务交给了第六团，一营为突击营，二连为突击连，连长何万祥为突击队长，担任突袭城门的任务。

晚9时许，内线赣榆李亚藩部一团副官刘连城带领乔装下乡催粮的六团战士郝凤双、任发明向东北城门走去。郝凤双、任发明每人扛着一个鼓鼓的大口袋，盛满了黄色炸药，每袋都有二三十公斤，准备诓城不成，用来炸开城门。何万祥带领突击队，隐蔽在城东北角的一片竹林边，静静地等待着出击的时机。

见到刘连城，守卫马上从城楼上下来开门。刘连城掏出香烟递过去，任发明马

上用3根火柴划着给他点火。说时迟，那时快，烟还没有点着，郝凤双一只手抓住守卫的衣领，将其制服。

火柴的亮光，就是城门打开的信号。何万祥看到信号，带着突击排，在早已埋伏在城门楼上的我地下工作人员徐忠信配合下，像猛虎一般冲进城内。全连紧跟进城，俘虏了城楼上100多名伪军。在突击队的掩护下，主力部队如潮水般涌进了城内。

赣榆战役生俘伪旅长李亚藩等官兵1600余人，缴获步、马枪830余支，轻机枪5挺，小炮14门，手枪40支，战刀500把，指挥刀30把，战马30余匹，汽车2辆，还有3万多发枪、炮弹等大批军用物资。攻城部队仅亡3人、伤37名。

12月5日，滨海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宴请了何万祥等47位战斗英雄，为他们庆功。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远道前来参加了盛会。肖华在讲话中表彰了赣榆战役中担任突击任务的二连，并把二连命名为“赣榆连”。

猛打猛冲是何万祥的战术特点，他认为：敌人都该早早消灭。没有空和他们啰嗦！

石沟崖是莒县与日照县之间的一个山村。这个村子坐落在一片山凹里，地势十分险要。汉奸朱信斋在日军支持下，在这里修驻了坚固的据点，驻有三个中队400多人。1944年1月21日晚，也就是农历腊月二十六，滨海军区六团在团长贺东生的指挥下，发起攻打石沟崖据点的战斗，决心杀“朱”过年。任务下达后，几个连队先后攻击都未能得手。时间不易久拖，石沟崖战役打响了的第二天下午，团首长痛下决心，命令何万祥带领全连突破朱信斋最后一个围寨的东南角。围寨的防务工事设计得密不透风：围子外边是一圈深宽一丈五的外壕，外壕的四个角上有着可以交叉射击壕底的炮楼，外壕靠里翻土的一面，四周密排着和壕沿一样平的地堡，壕底堆着蒺藜棵，壕外拦着铁丝网。早晨，别的连攻了几次，没攻进去。何万祥早就发急了，他被围寨的险恶和朱信斋的顽抗，气得一直乱骂。可是，上级没下命令，他又不敢随意行动。下午，指挥部进行了新的战斗部署，终于命令他的连队突击了。

他像往常接受突击任务时一样的振奋，把驳壳枪向天上一扬，尖着嗓子向全连喊：“同志们！看我们的吧！冲不开这个鬼围寨别回来！”

双方炮火在不到50米宽的地带展开了轰击，迫击炮、掷弹筒、重机枪、轻机枪一齐开火。几个战士利用烟雾作掩护，刚冲到外壕前，就被一阵枪弹打倒。我们一颗手榴弹把外壕角上的炮楼打去了半边，他把驳壳枪向前一挥，一、二排连续冲了上去。何万祥蹲在短墙后面，瞪圆了眼睛，看着战士们抬着梯子，提着铡刀向前飞奔，有几个半道两手一扬倒在地上，其他的砍断铁丝网，跳进壕沟里。叫人发急的事情发生了，跳下去的战士，遭受北面突出炮楼的猛烈侧射，更遭受地堡里连续飞出的手榴弹的轰击，浓烟滚滚，他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那里。然而，战士们跳下一个去不见了，跳下两个去也不见了，一连几个都没能冲上对面的壕沿。

过了几分钟，又有几个战士跳进去了，还是不见爬上沟沿。何万祥一看急红了眼，身体往上一跃，冲进了壕内。八班的战士们紧跟着连长跳进了壕沟。何万祥跳进壕底站定，看清了壕沿。突然一枚冒着白烟的手榴弹落到他的脚边。他用力一脚，踢出十几米远。他不顾蒺藜棵的刺痛和弹片地飞舞，第一步就蹿上了对面壕沿的半腰，他把身体紧紧贴在打毁的碉堡和掩体中间的积土上，躲开敌人的射击。八班战士照他的样子也做好了准备。这时，何万祥敏捷地举起驳壳枪，对准地堡枪眼就是一枪，骂了一句“娘卖皮”，紧接着又甩进去一枚手榴弹。地堡内传出一声惨叫，没了动静。八班战士以同样的手法，一口气攻下了几个地堡。然后向纵深突击。

敌人溃败了，沿着交通壕向围子退去，何万祥带领部队紧随其后，将敌人分割开来。我后续部队不断地攻入，消灭了敌人，活捉了朱信斋。何万祥连在这次攻坚战中战功卓著，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颁发命令，批准何万祥为军区战斗英雄，授予甲等奖品。

三

何万祥攻如猛虎，守若泰山，攻守兼备，是八路军中的难得的连队指挥员。参加过郯城战役的人都记得，战役最后一天打增援的事情，那是打得十分漂亮。1943年1月16日，一一五师决定由何万祥所在的教导二旅趁敌人倾巢出犯，后方空虚之机，远距离奔袭郯城，歼灭守城敌人。19日深夜，部队经过40公里急行军，突破敌人封锁线，直逼郯城。六团先机抢占南关，猛扑到南关城门下。20日上午，南城门之敌向城里败退，北城墙也被八路军突破。城内日军龟缩在两座炮楼内顽抗。这时，驻守在离郯城9公里的马头镇的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400余人，向郯城扑来，企图解围。

何万祥接受了阻击敌人援兵的任务后，带领全连战士跑步出城，选择有利地形，构筑阵地，严阵以待。他对战士们说：“城里只剩下炮楼了，我们要死守住这里，不让敌人靠近郯城一步，保证兄弟部队全歼城里敌人！”

敌人离他们只有几十米远时，何万祥大喊一声：“打！”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敌人队形大乱，狼狈地退了回去。过了一会儿，敌人再次组织冲锋，先是用炮轰一阵，接着“哇哇”叫着冲了上来。何万祥率领几十名战士，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沉着应战，从早到晚，敌人始终不能靠前一步。直到郯城内的炮楼被炸毁，城楼上日本旗没了踪影，敌人援兵才气急败坏地退回马头镇。

战役最后一天，为了掩护部队和群众撤出郯城，防止敌人疯狂的报复，何万祥带领53个战士铜墙铁壁般地挡住了500鬼子的四次轮番冲锋。

当时，他和战士匍匐在郯城北门外临郯公路口的土城上，指导员在第一天打码头敌人的增援时候牺牲了，弹药也所剩不多了，但是人在阵地在，何万祥一拍胸脯，向旅首长保证说：“你放心，我何万祥什么时候充过孬！”

敌人蜂拥而来，子弹遮天蔽日，何万祥和他的战友们岿然不动。端着刺刀的鬼子，气喘吁吁地吼叫着扑向土城，看看迫近的鬼子，看看焦躁不安的战友，看看密排在自己面前几十颗拉出半截弦的手榴弹。他终于喊了一声：“打这些娘卖皮的”。手榴弹像黑老鸱样飞了出去，到处是轰鸣和硝烟。

烟尘散去，活着的敌人调转头跑掉了，死去的敌人，倒在公路上，麦田里，土城边。

何万祥从尘土里爬起来，向自己的阵地看了一眼，他的眼睛里闪烁出愤怒的光芒，几个战士的头伏在土坡上一动不动了，几个活着的战士抬起沾满尘土的面孔，骨碌碌的眼珠紧看着他。他弯腰捡起五班长杨连生压在身下的三九式步枪，擦了一把上面的鲜血，“哗啦”子弹推上了膛。透过炮火的轰响，他咬着牙根尖声喊道：“有我何万祥在这里。同志们！沉住气呀！”

敌人在不远处整理了阵容，冲锋又开始了，炮弹的爆炸声没有了间歇，机关枪潮水似地吼叫着，烟尘遮住了太阳。

何万祥偏着脑袋，用右眼向看地平线看去，公路上一个矮个儿鬼子挥舞着闪光的洋刀，他的身后，扬起了高高的尘土，有一种像推磨一样沉重的轰隆声。“汽车。”一个战士忍不住喊了出来。



“汽车管屁用，准备手榴弹！”何万祥熟练地在右手的二拇指和小手指上套了手榴弹的拉火环，左手也套了两个，鹰一般地盯着前方。

敌人缓慢地推进，两辆汽车左右摇晃地跟在后面。

“娘卖皮。”他边看边和通讯员说：“像是一边冲锋，一边抢尸首，见他的鬼喽！”

“打呀！”他发出命令。自己第一个连着甩出四颗手榴弹，接着又是四颗，战士们的手榴弹雨点般地甩进了敌人密集的冲锋行列。

敌人完全混乱了，汽车扭转屁股，开足马力逃跑。步兵借着烟雾滚滚爬爬地败退，何万祥探出半个身子，端着鲜血染红的三九式，一连打倒三个，枪声中，拿洋刀的鬼子半截口袋似地倒在了土坎上。

第四次冲锋开始了，一个胡须垂到胸前的鬼子指挥官挥舞着洋刀乱舞乱跳。鬼子们趴在地上齐声呐喊，迟迟不再向前，显然，鬼子们被八路军的气势压倒了，指挥官发狂了，拉起一个趴在地上不动的鬼子，手起刀落劈在了地上，又拉起一个鬼子……。

几百个鬼子发了疯似地吼叫着，蜂拥着向前扑来，这时我军的阵地上已经没有了子弹了。何万祥抬头看了看那定格在空中的太阳，一个小时是坚持下来了，他向所有的战士挥了一下帽子，战士们沿着壕沟迅速撤退，他却带着通讯员依旧卧在原地，为了掩护战友们，他把危险留给了自己，有几个战士跑过来要替换他，他厉声说：“走你的，老子不再打几个不过瘾。”

战士们撤退了。一挺轻机枪的枪口突然从堑壕外伸到他的鼻子前面，他反应迅速，顺手掖过去几颗手榴弹，随着爆炸声，他与通讯员快闪，转过拐角不见了。

对于生与死，他从来没有顾虑过，他知道打仗要死人，但党的事业鼓舞着他，他和战士们说：“革命就得拼命，怕死就别革命。”

他认为：不怕死的，子弹轻易打不上；怕死的死得倒快。他在战斗检讨会上时常对战士们举类似的例子：“你看，某同志大胆，动作迅速果敢，子弹没打上他，他倒打倒了几个敌人。某同志怕死，动作犹豫，缩头缩脑，不敢打敌人那还不当敌人的枪靶子，有鬼！”他为人民立下了无数功勋，在四百多次战斗中，只负过五次轻伤。

四

何万祥一年四季总穿着不像样的旧军装，领导同志看见他，总要说：“你该收拾得像个样子。”他的答复常常是一样的：“你就叫我这个样子吧。新衣服都给班里拿去了。”除了一条被子，他的包袱常常是空的。

有一天，他坐在床沿上，换上一双刚刚发给连级干部的皮底鞋，一个战士开玩笑地说：“啊呀！连长的鞋子好漂亮啊！”

他说：“漂亮，你穿！”

“俺想穿，可是没有哩。”

“拿去！拿去！”他立刻脱下来，送给了战士。

冬天，他常常打赤脚，脚后跟上裂着小孩嘴样的口子，袜子都送给了战友。

在特务连，有一次连里的三个通讯员都感染了痢疾，他主动负责给他们做饭，端到床前，看着他们吃，并把他们的脏裤子、脏床单都给洗了，通讯员们激动地说不出什么，他看着他们窘态，自己也不知说什么好。

他冲劲起来，脾气很坏。但战士们体谅他的“直筒子”脾气。大家都知道连长的心里没什么，过去那一阵就好了。一次，他刚对一个战士发了脾气，一转脸，战士立刻正经地向他提出意见：“你这个连长光熊人还行？以后咱不兴这样方式。”

他难得地笑了起来：“我熊得不对，你胡闹也不对，以后都得改！”

他每逢离开一个连队，战士们都会苦苦挽留。他总会站在队前，无可奈何地说：“少啰嗦，干革命吗！革命就不能老在一起。”看着面前这些熟悉的面孔，这些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他越激动越语促越难以表达，匆匆地离去也更说明难舍的留恋。

1944年3月，鲁中军区决定歼灭伪军吴化文部。一营担任歼灭驻在大泉山吴伪军一个营的任务。伪军在山顶上修有两米高的围墙，内有三层高的炮楼，外有暗堡，铁丝网。3月25日夜里，开始攻夺大泉山。三连担任主攻，何万祥带领二连作为预备队。

战斗打得很残酷。三连迟迟不能攻下敌人据守的围寨。营长命令二连接替主攻。何万祥一接到命令，立即带领三排向大泉山上奔去。在炮火掩护下，何万祥带领部队突到围墙的缺口前，搭起人梯，从被炸残了的炮楼爬上围墙。紧随着三连高排长，何万祥带着通信员王进东刚从围墙上落地，敌人的重机枪就从碉堡里扫射过来，高排长倒下了，何万祥提起两颗手榴弹，从侧面绕过去，直奔残敌固守的这最后一个碉堡，楼梯上，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喉部，他倒在地上。通信员王进东一看连长倒下了，猛喊：“为连长报仇！”战士们响应着：“报仇！”冲上了碉堡，消灭了这群汉奸。大泉山被攻克了，英雄却长眠在了这块土地上。

为了表彰和纪念何万祥这位英勇善战的连长，山东军区把大泉山缴来的重机枪命名为“何万祥重机枪”，把他生前带领的连队命名为“何万祥连”。

跟何万祥一起冲进石沟崖外壕的八班长刘进功说：“跟何连长一个连，不勇敢的也勇敢了，每逢打仗，咱到哪里，连长到哪里；连长到哪里，咱也就到哪里了。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梦见和他一块儿打仗。”

萧道成：从称臣到称帝

吴海艳



萧道成

公元477年，七夕节。

南朝宋后废帝刘昱在这一天白天的行程非常混乱。《宋书》和《南齐书》中有不同的记载。

《宋书》说刘昱当天乘露车，带着200左右的人，与往常一样没有带仪仗装饰，到民间去野混。先是去了往青园的尼姑庵，傍晚的时候他又到新安寺找昙度道人饮酒。

《南齐书》也说刘昱当天在外微服游玩。刘昱出北湖，像往常一样骑着单马飞奔在前，羽仪禁卫等人随后追赶。一行人在堤塘之间相互蹈藉，狼狈得很。突然刘昱的随从张互儿的马在追赶拥挤之中坠下湖去。刘昱很生气，把马拉上来，赶到光明亭前，自己玩起杀马游戏。马被杀后，他和随从一起屠割马肉。大家一起学北方的羌胡人，边割肉边唱歌跳舞。傍晚的时候，刘

萧道成（427年—482年），字绍伯，小名斗将，西汉丞相萧何二十四世孙。祖籍东海郡兰陵县（今山东省兰陵县），南北朝时期南齐开国皇帝，479年—482年在位。

萧道成年少在名儒雷次宗处接受教育，钻研《礼》及《左氏春秋》。性情深沉，通习经史，为南朝宋将军，后被封为齐王，受禅为帝，改国号为齐，建都建康。482年，萧道成去世，终年55岁，葬于泰安陵。死后庙号太祖，谥曰高皇帝。

齐朝（479年—502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二个朝代，也是南朝四个朝代中存在时间最短的一个，仅有23年，史称南齐、南朝齐（以与北朝的北齐相区别）或萧齐。



刘昱行乐图

昱又去了蛮冈赌博。

夜深了，刘昱终于回到宫中。

当晚，刘昱是在仁寿殿东的阿毡屋中就寝。临睡前，他突然记起今天是七夕。于是，刘昱就对随从杨玉夫说：“今天晚上织女渡河与牛郎相会，我要看看织女的模样。等织女出来了，你叫醒我。如果看不到织女，我明天就杀了你。”

杨玉夫大惊失色。他如何能够让刘昱看到织女？杨玉夫马上想到了“伴君如伴虎”。现在为了自卫，他不得不去打虎了。杨玉夫知道同伴陈奉伯等人平日里与禁卫军校尉王敬则等人互通消息，有过密谋。于是他就去找陈奉伯，将事情起因和自己要杀小皇帝自卫的计划和盘托出，寻找配合。陈奉伯一面联络王敬则，一面和杨玉夫联络了更多的刘昱侍卫、随从，准备共同起事。结果，二十五个刘昱平日的亲信聚集起来，决定弑君。

事不宜迟，杨玉夫带了几个人来到刘昱休息的毡房外，只听鼾声阵阵。杨玉夫等人突入毡房之中，取出刘昱的防身刀，当场将熟睡中的小皇帝杀死。刘昱时年16岁。杨玉夫将刘昱的头颅割下，又假传圣旨，宣禁卫军校尉王敬则入内，商议后事。

大家商议的结果是决定利用小皇帝平日的生活习惯，偷偷出宫，将萧道成引进宫来主持大事。于是，王敬则领头，杨玉夫假扮刘昱，陈奉伯提着刘昱的脑袋，向宫外走去。刘昱之前经常在深更半夜出宫，陈奉伯等人就声称皇帝要出宫，王敬则陪护。宫廷一千人等一见是小皇帝的贴身随从和禁军校尉陪同“皇帝”出宫，没有丝毫的怀疑。刘昱每次出门，门卫和士兵们惧怕他的喜怒无常，都不敢正视他。这天夜黑，宫人只知道慌忙打开承明门，看都没看清到底是不是刘昱本人出宫，就放走了一行人。

来到领军府外，王敬则称带了皇帝的首级来请萧道成入宫主持大事。因为事起突然，萧道成之前毫不知情。现在突然深夜有人说杀了皇帝，请你入宫，无论是谁，都不会相信这是真的。萧道成的最初判断就觉得这极可能是刘昱对自己的考验

或者是另一场恶作剧，因此下令家人紧闭大门，不要放人进来。

王敬则无奈，急中生智，将小皇帝刘昱的人头从门上抛了进去。萧道成忙命人将脑袋上的污血洗去，亲自查看，果然是刘昱的首级。他大呼了一口气，这才下令大开府门。

萧道成意识到自己的机遇来到了！

二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萧道成这样撞上大运的。

萧道成听完王敬则的报告后，迅速决定入宫。他全身戎装，率左右数十人，由王敬则、杨玉夫等人引路向宫中奔去。这一次，他们声称是皇帝回宫，让宫中开门。宫廷内照样没有丝毫的怀疑，打开了宫门。

承明门刚一打开，萧道成就驾着常骑的赤马当先冲入。宫中见放进来的是全副武装的萧道成及其侍卫，大惊失色。萧道成的赤马高大威猛，也许是头次进入深宫的缘故，扬蹄嘶叫起来，竟然镇住了不知所措的宫人们。萧道成日后登基，封这匹赤马为“龙骧将军”，民间称这匹马为“赤龙骧”，可见这匹马确非寻常马匹。王敬则等人趁机高举着刘昱的脑袋大喊：“昏君已死，萧领军入宫主持大事！”殿内一片惊怖，片刻后都高呼起万岁来。萧道成随即下令自己控制的禁卫军陆续开到皇宫内外，连夜控制了整个局势。

萧道成又派人去召集护军褚渊、司徒袁粲、尚书令刘秉三位辅政大臣入宫，商议废立事宜。褚渊原本与萧道成的关系极好，入宫知道真相后，坚定地站在萧道成一边。司徒袁粲、尚书令刘秉两人原本权力地位与萧道成相当，现在见萧道成一夜间主持了朝政，加上自己对皇帝猝死等事毫无所知，自然心怀不满。在新的权力分配方面，袁刘二人也不愿意萧道成独霸朝政。

天明后四贵在殿庭前的槐树下集议。萧道成依然一副戎装，先对刘秉说：“刘大人您是国家重戚（刘秉是皇室成员），今日之事，应该由您主持。”刘秉没有想到萧道成会来这一手，慌乱地推辞了。萧道成又让袁粲主持废立之事，袁粲也不敢接受。萧道成于是当仁不让地宣布，备法驾去东城迎立宋明帝第三子、刘昱的弟弟、年仅11岁的刘准为新皇帝。袁刘二人这时候又后悔了，想发表意见，但是萧道成布置的士兵用长刀组成了刀墙，阻遮在袁粲、刘秉等人面前。两人只好失色而去。

皇太后天明后也知道了消息，但是生米已做成了熟饭，只好接受现实。太后下令说：“刘昱穷凶极恶，自取毁灭。但是将他废为庶人，我又有所不忍。可特追封为苍梧郡王。”刘昱被葬于丹阳秣陵县郊坛西。

刘准登基后，史称宋顺帝。萧道成因为有扶立之功，进位为侍中、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持节、都督、刺史如故，封竟陵郡公，邑五千户，给油幢络车，班剑三十人。萧道成坚决推辞，只接受了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不久又兼管了南徐州、豫州、司州三个州。对杨玉夫等25人不仅没有追究弑君的罪责，而且还封赏爵邑。萧道成独掌了朝政。

三

萧道成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其他大臣的反对。

先是袁粲、刘秉两人的起兵反抗。虽然他俩与萧道成同为辅政大臣，但与在前

线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萧道成不同，他们并无经世之略。萧道成凭借强大的禁卫军和控制首都的优势，很快打败了两人。袁刘二人身死。荆州刺史沈攸之是刘宋的实力将领，也起兵讨伐萧道成，结果在郢城一战中失败，军溃身死，首级被带到建康示众。同时萧道成还诛灭了反抗的镇北将军黄回。

在镇压了内部的反对势力后，朝廷封萧道成为太尉，增三千户人口，都督南徐、南兖、徐、兖、青、冀、司、豫、荆、雍、湘、郢、梁、益、广、越十六州诸军事。萧道成不仅辞掉了都督，连骠骑大将军的职位也自我解除。朝廷只好增加了他的仪仗和待遇。

萧道成之所以这样推辞，是觉得自己的声望和功绩还远远不够。在这一时期，他主要通过加强内政建设来塑造自己的权力形象。年轻的时候，萧道成曾经立下过“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泥土同价”的宏愿。一次，他与族弟萧顺之登上武进的金牛台，见到枯骨横道。萧道成说：“宋文帝之后才几年时间啊，怎么又出现了这样的惨况！”当时他凛然的表情让萧顺之为之动容。元嘉之世结束后，南朝上流社会奢侈成风，百姓也不事节俭。萧道成主政后，罢御府，清理宫殿和官府的饰玩，又禁止民间的华伪杂物。他以节俭勤政入手，积蓄国力，减轻百姓负担，推动了刘宋王朝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随着萧道成威望的提高，478年9月，宋顺帝晋封萧道成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给予他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待遇。这一回，萧道成在经过坚决推辞、朝廷屡次下诏敦劝之后接受了假黄钺，但是辞去了过高的特殊待遇。第二年，朝廷再次重申前命，给予萧道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特殊待遇，萧道成这才接受。他的接受是一个特殊的信号。三月，朝廷又晋封萧道成为相国，总百揆，划土十郡为齐国，封他为齐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位在诸侯王上。依照惯例，萧道成退让了三次，朝廷和公卿敦劝请求之后，他才接受。四月，宋顺帝颁诏将帝位禅让给齐王萧道成，于是，萧道成在建康南郊登基称帝，国号齐，是为齐高帝，史称南齐。

这样的情景对于南北朝的群臣和百姓来说，并不陌生。南北朝是一个禅让遍地开花的时代。兵荒马乱时节，有枪就是王。有头有脸的实力派都梦想着向皇帝宝座冲刺。而你让位、我接受的禅让形式是当时普遍盛行的游戏规则。禅让形式可以在台面上给被迫让位的前朝皇帝有台阶可以下，用相对和平的方式将政治变故的破坏力限制在相对低的水平。受禅者还可以在禅让的过程中稳步“接班”，为自己赢得名声，营造出“万民请愿，人心所向”的景象来。因此禅让形式在南北朝时期被广泛采用。

萧道成现在就是在重复权臣受禅的过程。

四神刻石

高昂



四神刻石，民国三年（1914）出土于山东莒县于家庄，庄钰方得。1980年由官衍兴鉴定购归济宁博物馆藏。

此石刻于东汉灵帝刘宏熹平二年，即公元173年。主要内容是祈禳消免灾祸，所以又可称为熹平刻石、禳祸刻石，通称为“四神刻石”。

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四方之神，又称方位神。青龙——东方，白虎——西方，朱雀——南方，玄武——北方。与其对应的是四方天帝，即东方——青帝，西方——白帝，南方——赤帝，北方——黑帝。汉墓画像石中少不了四神图像，但是，用文字刻在一块石头上，却很少见。四色神石原文为：

熹平二年四月己卯朔十九日丁酉时加才（在）

东方青帝禹青龙患祸欲（来*）

南方赤帝禹朱雀患祸欲来

西方白帝禹白虎患祸欲来

北方黑帝禹玄武患（祸*欲*来*）

该石为赭色沙质不规则的自然石片。长52厘米，最宽处为46厘米，字径2厘米左右。共5行62字，存57字。第一行共18字存17字；第二行11字存10字；第三行11字，完整；第四行11字，完整；第五行11字存8字。

抗战歌曲选——

《跟着共产党走》

本 编



久鸣（1918—1995），原名王承骏，曾用名王承骤、王岳，笔名久鸣。原籍浙江宁波，出生于上海，在音乐专科学校受过专门教育，1937年奔赴延安，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进入洛川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毕业后成为八路军的一名文艺工作者。1939年任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副主任，1946年至1949年受组织派遣往返于上海、南京等地从事地下党工作，直至解放。1952年任交通部教育司科长，1959年调到河南省交通学校任学生科科长，1961—1979年下放至河南温县（其间经历“文革”迫害，身体致残，一只眼失明），1979年交通学校复校又回校任学生科科长。1980年担任河南省音协副主席。1982年离休。在近60年的生涯中，久鸣共创作200多首歌曲，主要作品有《跟着共产党走》《晋东南进行曲》《文工团团歌》《抗日军进行曲》《饮马黄河谷》《今年要报去年仇》《夜行军》《新中国的海员》《绿城美》《踏着雷锋的脚步走》《晨歌》《祖国》。199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久鸣的歌集——《老战士的歌》。

跟着共产党走

1=F $\frac{2}{4}$

沙洪词
久鸣曲

3. 1 | 6 3 | 0 3 3 5 | 6 6 | 6. 7 5 |
你 是 灯 塔, 照 耀 着 黎 明 前 的 海

5. 0 | 3. 1 | 6 3 | 0 6 5 6 | 3 2. 3 |
洋, 你 是 舵 手, 掌 握 着 航 行 的

1 7 | 6 - | 6 6 | 3. 3 | 6 6 |
方 向。 年 青 的 中 国

5 6 3 | 0 3 2 3 | 1 3 | 0 3 3 5 | 6 6 |
共 产 党, 你 就 是 核 心, 你 就 是 方 向。

6 6 6 | 1. 2 | 3. 2 1 2 | 3^v 3 3 | 5. 6 |
我 们 永 远 跟 着 你 走, 人 类 一 定

5 4 | 3^v 3 3 | 6. 7 | 1. 7 6 5 | 6^v 2 2 |
解 放, 我 们 永 远 跟 着 你 走, 人 类

5. 6 | 1 7 | 6 - | 6 0 :||
一 定 解 放!

注：作于1940年6月鲁中敌后；1980年5月起将“年青”改为“伟大”。

沂河桥的故事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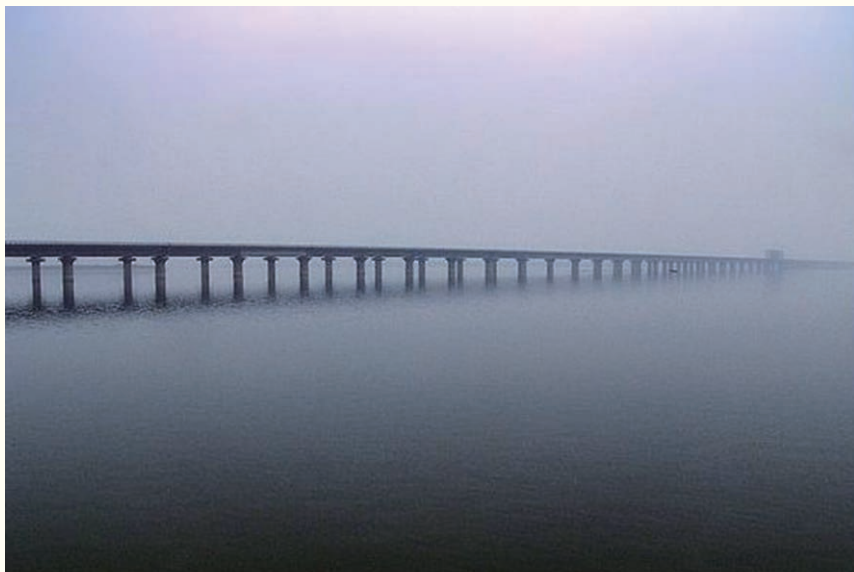
本 编

2014年底建成通车的临沂市首座真正意义上的斜拉桥——临工大桥。大桥东接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327国道，西接罗庄区罗程路，为市区中环南线重要节点工程，临工大桥为双塔双索面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全长2980米，桥宽30米，双向四车道。索塔高度为114米，共设56对112根斜拉索。桥体颜色为鲜艳的“中国红”，其技术繁杂、工艺先进，创造了多项临沂之最，甚至在山东省都名列前茅。



横跨沂河的陶然路沂河桥今年6月25日通车。该桥全长2288米，为五塔六跨连续矮塔斜拉桥，主塔10座，高26米，缆索造型优美，像一把把竖琴。主桥宽38.6米，双向六车道。大桥与兖石铁路桥并行沂河，成为沂河上的亮丽景观。





沂河北大桥位于北城新区北京路东端。大桥总长551.4米，跨径为18孔30米，桥梁总宽16米，桥面宽度15米，总投资1758.21万元。于2008年5月1日开工建设，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竣工。



九曲沂河大桥连接兰山区与河东区，位于兰山区解放路东端。

2001年3月6日启动，翌年8月16日辄竣。桥身81跨，长1960米，主桥1620米，宽18.5米，抗震设防烈度为七，可抵百年一遇之洪水。



光耀大桥连接罗庄区与河东区，位于沂河路东端。大桥1998年通车，桥面全长1560米，宽27米。原名“罗湖大桥”，2011年5月改名“光耀大桥”。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争

赵 炯

在八年的抗战中，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与日伪顽进行坚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的同时，在经济战线上也进行着同样激烈的货币战争。经济斗争、货币战争虽无硝烟弥漫，刀光剑影，不像武装斗争那样枪林弹雨，血雨腥风，却也同样是尖锐复杂、斗智斗勇、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而且还要遵循经济规律，掌握货币物价的特点，其成败亦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存亡发展和抗战大局。

一、抗战催生了根据地的货币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根据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中共北方局提出的“每个优秀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结合山东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和组织抗日武装的十条纲领。在中共山东省委的统一部署和各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举行了大小数十次抗日武装起义，抗日救亡的烽火迅速燃遍了山东大地。1938年1—5月，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各地抗日武装作战百余次，先后袭击攻克过十几座县城，开辟了鲁中、鲁南、胶东、泰西、湖西、鲁西等若干块活动基地，不断打击敌人，有力地配合了津浦前线正面战场的作战，政治影响日益扩大，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到1938年夏季，已发展到4万余人。抗日武装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同日军的战斗，而是部队的吃饭、穿衣、花钱问题。当时各部队都建立了募集队，随用随筹，谁用谁筹，虽天天为吃饭奔忙，仍是饥一顿饱一顿，毫无保证。不解决这个问题，抗日武装不仅不能发展，也难以存在。若是自己有钱，情况就好多了，于是就想到了印钞票。当时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十分混乱，既有国民政府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发行的“法币”，也有山东银行发行的一元券、山东金库发行的兑换券、山东平市官钱局发行的铜元券、韩复榘的山东民生银行印制的角票、“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印制的5元券，还有各大钱庄、商号、县政府、商会、驻军印制的土杂票、清朝和袁世凯时期发行的银元、铜板

及散碎金银。1938年3月，日寇侵占华北后，在北平成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大量发行伪联银券，日寇占领临沂后，强制使用，不但在沦陷区流通，而且侵入到抗日根据地。初建的抗日政权因没有自己的银行和货币，无法开展打击伪币的金融斗争，也难以运用金融的手段筹集和调剂资金，不仅难以保证战时的财政需要，而且要想把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也变得十分困难。在这种形势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割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货币。根据中央这一指示，1938年10月，北海专署筹集资金25万元，率先在掖县筹建北海银行。北海银行正式开张，发行1角、2角、5角、1元四种面额的“北海币”，颇受人民欢迎。1939年，抗日军政机关撤出蓬、黄、掖三县城后，北海银行曾一度停业，但“北海币”仍在胶东根据地流通，信誉很高。同年9月，北海银行又在山沟里重新开业。

1938年12月，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武装的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1940年4月，山东纵队供给部开始自己印制钞票。最初只有两部脚踏印刷机，两个工人。自己不能制版，先在敌占区的济南将纸型、图案、颜色、面值印好，然后秘密运回沂蒙山区的山纵驻地，再加印上行名、印章。下半年，通过地下党，以伪币一万元的价格（以黄金折付），干脆将济南的大中印刷厂的全部设备买下，又动员了20多名技术工人，一起秘密运来沂蒙山区根据地。至此，印钞的力量大大加强，但印量仍然太少，难以发挥主要作用。与此同时，各地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也各自先后印发了一些自己的钞票。如鲁南区曾发行过“临郑费峰流通券”、鲁中区的莱芜县发行过“农民合作社流通券”、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曾发行过“益寿临广四县边区流通辅券”等。

面对战争的持久性，保障部队的供给，绝不是权宜之计，不仅要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还必须有长久的打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需要迅速建立财政制度和财政体系，而且需要创立根据地的统一货币。1940年秋，山东战工会决定将北海银行改为山东北海银行，在鲁中设立总行，由财政处领导，处长艾楚南兼任行长，各地区相继成立分行、支行，县以下设营业点。北海币很快在各根据地乃至敌占区流通。至此，根据地有了自己的统一货币。

二、抗击经济侵略 开辟金融战场

北海银行营业体系建立起来后立即投入战斗。针对当时土杂钞泛滥，敌伪币入侵，敌人利用“法币”“套取法币”等情况，1942年前采取“坚决保护法币，严禁



使用伪币，部分地发行地方货币，取缔土杂钞”的政策，发起了根据地货币战争的第一波攻势。

首先是打击伪钞。

敌伪占领华北后在北平成立了伪“联合准备银行”，大量发行联银票，先是在各大城市和交通沿线流通，逐渐向根据地推行。日伪采取的措施是大肆搜刮“法币”；强迫推行伪币。他们一是强迫据点附近的集市并到据点里，诱使群众到据点里赶集，用伪钞交易。二是出动部队突然包围集市，搜索群众的腰包，对法币实行没收或压价收兑。鉴于此种情况，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采取争锋相对的办法。一是严厉查禁伪币，对将伪币带入根据地者予以处罚没收，并且组织查缉，进行提成奖。二是讲明危害，教育动员群众不得使用伪币。三是采取在敌人据点周围增设早市小集，便于群众交易，使其免受损失，以此来对付敌人的打集并集。上述措施实施后，伪币流通范围日渐缩小，不但根据地绝迹，游击区一般人也不使用。1941年冬，山东平市官钱局及民生银行被日伪接收后，继续发行钞票，1942年1月11日和1月20日，山东战工会发出通知，禁止民生银行的钞票和伪平市官钱局的纸币流通使用，使其在根据地市场难以合法使用，只能在游击区和个别商人中隐蔽使用。

其次是取缔土杂钞。

抗战初期因社会秩序混乱，金融滞涩，各地政府、驻军、商会、铺号商家大量发行土杂票。1941年，仅滨海区即有土杂票300多种。临沂城即有钱庄票百余家印制纸币，当时信誉较好发行量最大的纸币，是由资本最大的永泰钱庄发行的由上海中华图书馆承印的“铜元票”。日照县仅涛雒、石臼、两城3个镇及竖旗、马庄、三庄、高兴、虎山5个区578家商铺中，就有441家出票子。山东境内的国民政府和军队发行的货币也多达二三十种，如临沂县政府多次印制的一千文、五千文等不兑换军票、奉军师长方永昌印制并强迫使用的军票等，给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严重阻碍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1943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在地沂水、临朐东里店一带，高粱每斤100元（北海币4元）、猪肉每斤400元（北海币7元）“裕民银行”发行的纸币400多元才能兑换北海币1元。顽固派赵保原统治区，赶集的人每人都要背一个装钱的大包袱，如要买一头13万元的毛驴，须先借一头驴驮钱。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杂钞，分别采取了不同政策予以消除。一是对地方商会、商号、士绅发行的钱帖子，先由抗日民主政府通知发票人进行登记，然后限期清理收回；或由发票人交出发行基金，政府代为收回；对拒不执行者，发动民众持票向发票人兑现，如不兑现，由政府裁决，将其财产抵偿。二是对汉奸和逃亡者，则以其财产变价进行收兑。三是对国民党地方武装政权发行的杂钞，抗日民主政府概不承认，并严禁流入根据地。四是对顽固派投降派印制的票子，视情况采取没收其财产，予以适当收兑的办法。总之，尽量减少人民群众的损失。由于这些措施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土杂钞很快在根据地内绝迹。

第三是“排法”斗争。

1942年开始的“排法”斗争，由于内外各种原因，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复杂斗争过程。内因就是1942年之前，北海币作为根据地的本币，基本条件还不具备。主要是发行量少，1939年，胶东区发行北海币32.41万元；1940年，扩大到鲁中、清河区，三区共发行290.54万元；1941年，发行1455.79万元，发行量虽有增加，但扣除根据地的扩大和物价上涨近3倍等因素，相对来看发行量仍增长不大。三年累计，发行量不过2278.79万元，远不能满足根据地市场流通的需求。鉴于这种情况，就决定了北海币当时只能作为根据地的一种辅币和财政来源的补充，还不能作为本币使用。因此，采取了依靠法币，保护法币的政策。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国际形势骤变，日本向美、英等国宣战，日军占领租界，从上海、天津租界中，掠走了国民政府存放在外资银行的大约70多亿法币。法币失去作为国际货币向英美市场套取物资的作用，在日本人手中就变成了废纸。因此，汪伪政权自1942年4月1日起，一方面在占领区内全面打击控制法币，采取压低法币价格的手段，5月份又停止“中央”“中农”两行法币在沦陷区流通。一方面千方百计将法币倾入根据地，6月份限令沦陷区人民自6月8日起半月内将法币以1:2的比例兑换伪中央票。这样，就将有80亿法币在沦陷区失去市场。他们利用这贬值的法币大量套购根据地的物资，破坏根据地的金融、物价，造成根据地的大量物资外流，一度使根据地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危害。1942年12月17日《大众日报》载：莒南大店集上，百斤花生油陡涨50元；新浦日伪大批收购麦子、黄豆，囤积粮食达数十万石，且仍在继续收购。这是当时的外因。面对如此严峻形势，根据地针锋相对先后采取了法币贬值和停用法币的政策，开始了“排法”斗争。

5月29日，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当机立断，宣布北海币为本位币，作出《关于法币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立即实行贸易统制，严格实行以货易货阻止法币内流和物资低价外流。宣布以北海票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本位币。通令所有军政民间之来往账目、借约契据，自7月1日起，一律以北币计算。北币与法币，则应以北海银行规定的比价使用，如真能做到以货易货，还可将北币的价格提到伪币的高度，以完全停止法币的流通。

7月中旬，省战工会财经处召开金融扩大会议，确定经济战线上今后的中心任务：1. 实行北海币为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唯一本位币，北海银行要做好废除法币的准备工作；2. 建立根据地外向的汇兑；3. 加强银行的业务，和群众利益联系起来；4. 建立生产贸易管理局，统一生产，统一贸易；5. 加强进出口统制，普遍建立合作社；6. 平抑物价，争取出超；7. 禁止奢侈品入口，保证税收；8. 加强边沿区缉私工作，开发盐田，增加税收，彻底根绝税务人员的贪污腐化现象。会后各根据地迅速展开了“排法”斗争。滨海区率先发出布告：自8月1日起，以北海币为本位币，凡一切财政收支、市面交易，一律以北海币为标准，并作为公共和企业机关会计计算单位。自8月15日起，法币一律五折使用，并逐步停止在市面流通。自布告之日起，凡敌占区商人带法币100元以下者，须按五折向当地政府机关或北海银行兑换北海币使用；100元以上者，须交当地政府贸易机关代为封存保管，限期带回。自8月15日起，凡由敌占区带法币500元以上者，禁止入境，一经查获，给予没收。奖励以货易货办法，一切出入货物，须向贸易局或县政府领取运销证，始得起运，违者依法论处。运出的土产，必须换回相当价值的必需品，否则政府有权停止其贸易。奖励缉私，人人有权报告或查缉，一切缉获提成30%。各根据地也相继发出了类似公告。

但是，这次“排法”斗争，由于缺乏经济斗争知识和经验，对法币采取手段不坚决，准备不足，没有其他经济手段支持，宣传动员不充分，再加上缺乏统一领导，各地步调不一致，对外贸易仍执行机械的以货易货政策，不知调剂外汇，仅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强制推行，结果大出所料，除胶东区和沂蒙中心地区部分成功外，其他各地几乎全部失败。

这一情况引起了中共山东分局的高度重视，为了扭转不利的局面，中共山东分局认真总结了货币斗争的经验教训，深入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一、对敌斗争不断取得胜利，打破了被敌人分割封锁的局面，根据地有所扩大；二、日伪经济明显乏力，伪钞摇摆、跌价，法币因国民党主力部队退出山东而失去依托；三、随着“双减运动”的开展，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根据地的经济实力和物资基础有所增强；四、领导和组织对敌斗争的各级工商管理总局已逐步建立健全。

只要把握有利时机，掌握主动权，切实遵循经济规律，加强领导，各方紧密配合，协调统一，取得货币斗争的胜利还是有把握的。1943年6月30日，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关于货币斗争的指示》：“货币斗争已到更严重阶段，如我货币斗争失败，则坚持敌后抗战将会遭到更严重的困难。各级党领导机关须亲自来研究这个问题，亲自来组织和领导货币斗争工作。”货币斗争的基本方针是：坚决停用法币，禁用伪钞，使本币脱离法币影响，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借以稳定物价，消除法币伪钞膨胀所造成的经济危机。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9月份，山东分局决定成立山东省工商管理总局，以便统一领导。经过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宣传上的充分准备，第二波“排法”斗争全面展开。

新的一波货币攻势还是先从滨海发起的，滨海区于6月20日就做出停用法币的决定：“自布告之日起，粮食交易一律不准使用法币，自7月21日起，停止市面流通，自7月21日至8月10日为兑换期，7月31日以前，法币1元换本币1元，8月1日以后，法币2元换本币1元。自8月11日起查出行使法币者概予没收。为集中力量，统一工作步骤，各级政府成立停用法币委员会，由各级党政军民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村可组成停用法币小组，推行停用法令，有组织地将法币输送到敌占区，买回物资。”

姓氏百家漫谈——朱姓 (一)

赵丹峰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南省汝城津江朱氏祠堂，始建于明嘉靖三十六年

一、朱姓渊源

作为中华大姓之一，朱姓得姓出自如下几源：一是出自朱襄氏。这支族群早期主要活动于今河南淮阳一带，至今已传承了5000余年。据《姓氏急就篇·颜师古注》记载，舜帝时有位名臣叫朱彪，即为朱襄氏的后裔，其子孙便以“朱”为姓。

二是出自帝尧。据《尚书》和《元和姓纂》所载，上古五帝之一的帝尧有位儿子叫丹朱。其后裔便取其名字中的“朱”字作为这支族人的姓氏。

三是出自曹姓。颛顼后裔，系以国为氏。颛顼之玄孙陆终生有6个儿子，第五子名安，被大禹赐姓曹。待周武王灭商创建周朝后，安的后裔曹挟被封于邾邑，建邾国（遗址在今山东邹城市境内）。因國小势弱，只能依附

于鲁国。春秋时，才晋升为子爵之国。公元前281年，邾国终为楚国所灭，其王室成员为避难而逃至沛地（今江苏沛县）。为怀念故国，遂以国为氏，称邾氏。后来又将其右偏旁去掉，改姓为“朱”。今日国内的大多数朱姓居民，均系这一族群所繁衍的后裔。

四是朱暉之后。周朝时，微子启被封为宋国的开国国君，建都于商丘。其裔孙中有一位名为朱暉，便以国为氏，称宋氏。春秋时宋国灭亡后，其后裔逃难于碭（今安徽省碭山县），便以先祖之名中的“朱”字作为这支族人的姓氏。

五是出自改姓。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把国都由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迁至洛阳后，即颁布了数项关于移风易俗（即汉化）的法令，其中一项即是鲜卑人改用汉人的姓氏。为了示范，他本人即将皇室“拓跋”的鲜卑姓氏改为汉人的“元”姓，自己的姓名亦由拓跋宏改为元宏。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情势下，鲜卑人纷纷弃原姓而改为汉姓。其中浊浑氏、朱可浑氏皆改为汉姓“朱”氏。在以后的朝代中，也都有部分少数民族改为姓朱者。

二、朱姓郡望与堂号

朱氏族群在繁衍发展中形成了诸多郡望与堂号，较著名者有沛国（郡）朱氏、吴郡朱氏、河南朱氏、凤阳朱氏等郡望。其中沛国（郡）朱氏的开基人为西汉大司马朱诩。吴郡朱氏的开基人为西汉名臣朱买臣。河南朱氏这一郡望，则系由南北朝时北魏的浊浑氏和朱可浑氏两支鲜卑族所改为朱氏的后人，经过长期励志拼搏发展而形成的。

朱氏堂号众多，大小不一，遍布国中。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当数白鹿堂。南宋杰出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在任南康军知军时（宋代的军是与府、州平级的地方行政机构），在庐山脚下创建了闻名国内的白鹿洞书院，他亲兼洞主（即院长），为学生授课，为国家培育了一批人才。其后裔为缅怀他的业绩，继承和弘扬其精神风范，便以“白鹿堂”作为自己家族的堂号。此外，朱姓的另一代表性堂号“紫阳堂”亦与朱文公有关，因为朱熹别号为紫阳，紫阳堂这一堂号也系朱姓族人为纪念其先祖而起。



津江朱氏祠堂内景，牌匾“世界一家”为朱德手书。

三、族郡繁衍与分布

朱姓发源于今鲁南、苏北、豫东、皖北一带，属于今淮海地区的腹地。随着岁月的变迁，朱姓逐步发展成为华东地区的大姓族群。至汉代，朱姓族群已发展至河北、山西和陕西关中地区，甚至西南的巴蜀和东南的八闽，亦留下朱姓人发展的足迹。隋唐时，朱姓族群已迁播至湖南和广东。明朝，朱元璋开基坐天下，其众多子孙被分封于各地为王，一些原本别姓的有功之士亦被赐国姓为朱，加之明初向云贵地区的进军和屯垦，从而促进了朱姓族群的快速发展，诸多朱姓望族遂在各地应运而生，朱姓的发展进入了史无前例的黄金时期。明末，朱姓进入了台湾地区。清代，大批到南洋地区谋生、开拓者中亦不乏朱姓族人。目前，朱姓总人口约1500万余人。约占全国居民总数的1.2%。

四、朱姓名人纪略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朱姓族中出了不少有建树的名人，现简要述之：

战国时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即“养士”之风颇为盛行。一些掌有实权的贵族为称雄逐利，常常不惜“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一些本系平民布衣者，甚或是赌棍、盗贼、屠户者，由于有一技之长，经过贵族的养士、下士，竟成了某一政治事件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展示了其与众不同的卓越才干。此期，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和魏国的信陵君（时称“战国四君子”），即因养士而闻名。其中如信陵君魏无忌即养食客3000余人。魏有一隐士叫侯嬴，年已70岁，被信陵君魏无忌聘为食客，侯嬴又将做屠夫的朱亥推荐给了魏无忌。公元前257年，秦国举兵攻赵，赵国都城邯郸危在旦夕，遂派信使向魏国求援。魏王便派大将晋鄙率十万大军前去增援。秦王得知这一情报后，便放出重话威胁魏王。出于自保，魏王急命晋鄙于中途驻扎不动。时任赵国之相的平原君，其夫人系魏无忌的姐姐，平原君见魏国救兵不至，遂遣使者指责魏无忌道：“你我结成姻亲，就是因为仰慕您的高尚道义，能够急人之危，现在邯郸眼看要落入秦国之手而魏国之援兵却裹足不前，即使公子轻视我赵胜而鄙弃我，难道不可怜您的姐姐吗？”公子十分焦急，多次请魏王令晋鄙进兵救赵，又派宾客百般游说，但魏王始终不为所动。无奈之下，信陵君魏无忌就自己准备了百余乘车马，准备赴赵国以死相拼。他路过夷门时，遇见侯嬴，侯嬴便向其面授机宜。魏无忌便依计而行，通过最受魏王宠爱的如姬，从魏王那里盗来了调兵遣将的虎符（因为信陵君曾为如姬报过杀父之仇，故如姬才侠义相助）。根据侯嬴建议，魏无忌带上朱亥一同来到邺城见晋鄙，晋鄙合验兵符后有所怀疑，摆手看看公子说：“我率领十万大军屯于境上，今天您孤身单车前来替代我，是怎么回事呢？”话音刚落，力大无穷的朱亥即从袖中取出40斤重的铁锥，将晋鄙一举锥杀。夺取了兵权的魏无忌遂指挥大军前往救赵，击败秦军，使赵国得以解围。朱亥在关键时刻的果敢表现，令信陵君十分佩服和器重。后来，信陵君派遣朱亥出使秦国，秦王爱其威猛，要求其留秦效力，讲仁重义的朱亥感念信陵君魏无忌的知遇之恩，对秦国许诺的高官厚禄不屑一顾。秦王就将其关进一个装有老虎的大铁笼子里，不料被称为百兽之王的猛虎见了朱亥后，竟吓得趴在其脚下，动弹不得。秦王只好又将其囚禁起来，以期通过消磨其毅志，归顺秦国。性情刚烈的朱亥便以头撞柱，柱断而不死，于是再以手自扼其喉，终致喉断而歿。通过这节史实的记述，一个神勇无比且义薄云天的朱姓“士”的英



朱买臣砍柴

雄形象，便定格镌刻在读者的脑海里，“士为知己者死”这句恒言，在朱亥身上得到了真实形象的诠释与体现。

汉代，朱买臣和朱云是两位有建树的朱姓名人。朱买臣，会稽吴县(治在今江苏苏州市)人。其家境贫寒，更无产业经营，靠砍柴卖薪度日。朱买臣虽为樵夫，但却酷爱读书，经常肩挑一束薪柴，边走边诵诗书。其妻亦担负着薪柴相随，曾数次制止丈夫讴歌于道中。而朱买臣则愈发发声高歌，其妻以为羞耻，要求离去。朱买臣笑道：“我到50岁时应当富贵，而今已40多岁了，你跟着我过苦日子太久了，待日后我富贵时，定会报答于你。”其妻听后非常愤怒，说：“像你这种人如此下去，只会饿死于沟中，要得富贵，只能是妄想！”朱买臣挽留不住，就随她自去。不久，其妻便改嫁给一个农夫。妻子离开后，形单影只的朱买臣依然砍樵负薪，吟诵诗书，往返于山间集市。有一次他担着薪柴经过一墓地时，其原妻与后嫁的家人正在上坟，见朱买臣饥寒交迫之窘状，就拿所带饭菜给他充饥。一次偶然的机，朱买臣跟随本郡官府的人进京送礼，有幸结识了汉武帝身边的重臣严助，严与朱系同邑，交谈时觉得此人颇有学识才干，加之严助亦出身贫寒，顿生惺惺相惜之意，于是将其引荐给汉武帝刘彻。待见面见皇帝后，朱买臣说《春秋》，讲《楚辞》，武帝听后十分欣悦，当日即授其为中大夫，与严助一起在武帝身边供职，成为近臣。当时正议建置朔方郡，朱买臣与丞相公孙弘辩论，陈述利害十条，使朔方郡得以建制。是时，东越多次反复，妄图独立于朝廷。朱买臣便建言道：“东越王居于保泉山，此处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今闻东越王已将其中枢迁移至离泉山南面500余里处的大泽中。如朝廷趁此发兵浮海，直指泉山，而后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将其破灭也。”武帝对朱买臣的建议甚为赞同，便拜朱买臣为会稽太守。临行时，武帝对他说：“人富贵了不回故乡，就如同穿了漂亮衣服在黑夜中行走没人知道一样。卿今回故乡任职，又将如何呢？”朱买臣回到家乡后，看见其原妻和现任丈夫正与众人一起清扫道路，就停下车马，让他们夫妇坐到后车。回府后，就将他们安置在园中供养起来，享受清福。一月后，其原妻羞悔交加，自杀而死。朱买臣即给她丈夫钱财，将其妥为安葬。之后，肩负平叛重任的朱买臣便治楼船，备粮秣，修战具，待诏书一到，朱买臣与横海将军韩说等指挥军队勇猛俱进，遂破东越，巩固了朝廷对东南沿海地区的统治。朱买臣也因功被征为主爵都尉，位列九卿。其家族也在汉魏南北朝时期发展成为著名郡望，称吴郡朱氏。

丁守存和《编年自记》(上)

丁兆铭



丁守存

丁守存（1812—1883），字心斋，号竹溪、次海，晚号石涛钓叟。日照潍人。清末火器专家，军事科学家，为中国古代100位军事科学家之一，在《中国古代100位科学家的故事》中名列第79位。历任户部主事、军机处章京、湖北督粮道、两署按察使加布政使衔。《清史稿·列传九二·艺术四》《山东通志·循吏》《沂州府志》《日照县志》均有传。

丁守存16岁中秀才，19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入仕后不久的1839年即随林则徐广州禁烟，受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影响，开始研究夷国的“坚船”“利炮”。自学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西方自然科学。清政府曾命他陈述方略，并缮图进呈皇帝，两次均蒙留中，咸丰帝并亲自两次特地召见，长时间与他谈论军事。1842年随工部尚书赛尚阿赴天津查办军火、监造地雷、火机等器，并试制成功地雷，为中国近代制造地雷之始。

1843年，丁守存在化学实验的基础上，写成《西方自来火铳造法》一文，被收入《海国图志》一书。1849年，出任户部山东司主事。1851年，随钦差大臣赛尚阿赴广西办理军务，镇压太平天国义军。其间，与福建军事专家丁拱辰在桂林军中监造新式火炮、火箭、喷火筒等，为近代中国研制

火箭之始，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火箭之父”。1851年，在广西随赛尚阿参赞军事，俘虏洪秀全军师洪大全，负责监送进京（事见《随军日志》）。1853年，随兵部尚书孙瑞珍到沂州府办理团防，建民团，修圩寨，抵御东捻及幅军，并出任沂州琅琊书院山长。1858年，回京，授以道员衔，差往直隶，办理天津海防，督办直隶大顺广三府团防。1857年，曾一度回乡。1862年，再调直隶，筑堡200余所。1864年，授湖北督粮道，两次兼署湖北按察使加布政使衔。并一度负责曾国藩进攻南京太平天国的后勤供应。

1875年，辞职归里，曾婉言拒绝李鸿章的出山邀请，居家专事教书和著述。1883年逝世，享年72岁。丁守存著作颇丰，主要有《造化究原》《火法本论》《丙丁秘籀》《新火器说》《进呈御览》《筹河议》《筑寨图说》《旷视山房全集》等。

1882年，丁守存写成《编年自记》，以编年体史传形式，概括记述了自己从出生（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至去世前一年（光绪八年，公元1881年）共71年的生平史。虽然全书不到一万二千字，但真实记载了丁守存一生求学、仕途、教学，尤其军事科学等方面的成就，同时他个人的履历也从侧面反映了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历史状况。所以，《编年自记》不但是研究丁守存最直接、最可靠、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清朝后期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

《编年自记》现存北京图书馆，为海内外孤本。

《编年自记》原文

山左^[1]日照丁守存，字心斋，号竹溪，更号竹石山人。

始祖顺，明初自江南海州^[2]卫迁日照。四传至良儒、五传尧、六传珩，明庠生^[3]，寿官，祀乡贤^[4]。七传允元，天启甲子举人^[9]，崇祯辛未进士^[8]，由给事中仕苏州府知府，庐安兵备道、榆林道，陕西按察使司^[5]副使，以孙士一官，赠江南布政使^[6]，妣厉氏，赠夫人，殉明季难^[7]，祀节烈祠。子十二人，登甲科^[8]二，乙科^[8]一；孙三十一人，甲科一，乙科五；曾孙七十二人，甲科二，乙科八；雍正甲辰，兄弟叔侄同科四人，一门称盛。

本支高祖行十二，最幼，讳昂，字云青，廩贡生^[9]，候选训导。前妣臧氏，妣李氏。高祖士閻，字攀千，廩监生^[9]，妣李氏。曾祖龙曜，字晓沧，乾隆癸酉举人，拣选知县，以子丙午举人葵籀官赠文林郎，四川新津县知县，妣秦氏，赠孺人。祖葵芊，字叔朋，郡增生^[9]，妣秦氏、高氏，李氏生。父焘，字舒圃，本名燎，字光庭，妣秦氏。自曾祖以次，均赠如守存官。

嘉庆十七年，壬申，二月二十日辰时生。

父年三十二岁，母年三十四岁。

嘉庆十八年，癸酉，二岁。

嘉庆十九年，甲戌，三岁。

嘉庆二十年，乙亥，四岁。

先君口授《朱子家训》^[10]《文昌阴骘文》^[11]《魏元君劝世文》^[12]《刘文正公格言》^[13]并唐诗、《南窗梦弹词》^[14]，皆成诵。

每嬉戏，以土和泥，塑大字于壁。寄乳名于清静庵佛寺中。先祖本以晚年得孙，尤为钟爱。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五岁。

先君手录《孝经》^[15]一卷，读熟后训^[16]以虚字、语气、平仄声音^[17]。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六岁。

先君授读上《孟》^[18]一卷。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七岁。

先君授读中下《孟》二卷。辄与堂兄守经嬉戏门外水边石上，以手蘸淤泥为字，冬则凿厚冰镌字为碑。

时有善医陈某，每来村中诊疾，呼之“先生”。一日，遇门外，予肃立问曰：“先生将何之？”陈大惊异，谓先祖先君曰：“此儿非常人也”。

先祖授时文^[19]一卷，取张京江^[20]先生入泮^[21]之益者，题文为讲破、承及小讲六比^[22]规模。予凝竟夜，问：“此张公何时所作？”曰：“十四岁。”予应曰：“尚有七年，当不难也。”先祖喜甚，以“赤玉鱼”一枚奖之。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八岁。

先君授上下《论语》^[23]并乘除算法，又读《唐诗》一卷，字义颇能领悟。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九岁。

从族叔庠生^[24]讳舒读《学》《庸》^[25]并《朱注》^[26]。

是年，先叔祖丙午举人，讳葵籀，以疾歿于四川任所。

道光元年，辛巳，十岁。

二月入学，从堂叔庠生，讳焯读《尚书》^[27]。质钝，日不过三百字。

夏间，夜过半，梦寐中忽烦闷不可言，手扞胸前，粘结盈把，暗中频爬，置枕旁，比晓视，积厚分许，大如盏，刀刮之不去，濯之不下，黑如药膏，不敢告人。自是觉胸次清爽，慧悟异曩时。

道光二年，壬午，十一岁。

二月，先祖歿，年六十九岁。五七后入学，从邑处士^[28]刘夫子讳埶读。

道光三年，癸未，十二岁。

仍从刘夫子读。值大禩^[29]，家计衰落，先君远贸于外。先母亲操井臼，予辄奔往助力，先母曰：“汝但读，毋为此。”予曰：“是不废学也。”所食杂糠、秕、草籽、树皮，无升斗储。而先叔讳琛，又以腊月疾歿，无嗣，殓具罔措。先母罄^[30]簪珥不敷，仍贷诸人。以堂兄守在为嗣，叔母安氏食贫自力。后因守在不能安业，已继，复悔。

道光四年，甲申，十三岁。

从族兄增生讳文钰读，始开笔为文。颇蒙奖许，而好为驰骋，不知纪律。

道光五年，乙酉，十四岁。

从族叔祖庠生讳跻奎读。授以绳律^[31]。

道光六年，丙戌，十五岁。

仍从叔祖读，文思渐进。

道光七年，丁亥，十六岁。

家贫不能读，叔祖携予馆^[32]于城东之刘家村秦位东表叔家。

八月，始应童子试^[33]，不售^[34]。

道光八年，戊子，十七岁。

家益窘落，无力延师。族兄乾隆己酉拔贡^[35]讳文绅，字佩之，以老宿愿授予读。先君以祖遗竹园鬻值供薪水。师听夕讲授四子^[36]经义。无暇晷，每三更后始寐，鸡鸣则起，冬夜以冰浴面。

是岁统计：作文百余篇，赋五十余篇，诗律杂体数百首。

是冬，县试得前茅。

初聘室同邑磐石庄秦氏女，是年四月以疾歿。旋聘定许氏。

道光九年，己丑，十八岁。

佩之师携予馆于城南高家村安表兄延绪家。师不索修^[37]，安表兄给膳，亦不取值也。

是岁郡试屡前列，而文宗^[38]按临竟被落。予大愤惋。计无颜见亲族，亦自顾无生路，益奋志下帙^[39]。自八月至岁底，未解衣带。伺窗友皆熟寐，则露处窗外，隆冬不辍，衣履单寒，凝思僵立。以所熟古文百余篇、时艺^[40]三百余篇，轮旋默诵；西院有砖径一条，每步一砖，熟文一篇；作文柱香为度，炷五寸则一艺成。细绎四子书凡可以命题者，自揣皆能交卷，无甚难者。

岁暮旋里，床上衾褥折处，蛛网尘封数月矣。

道光十年，庚寅，十九岁。

仍馆高家村。

春应县试，以《春驹赋》取第一，正场名少后，初覆^[41]以下皆第一，遂定首选。县尊为闽之侯官壬午进士彭松屏师，讳翊。

四月，郡试第二。郡尊为江西新建戊辰翰林熊东岩师，讳遇泰。试后归，资斧^[42]绝，日枵腹^[43]驰百余里。

七月，科试入庠。学使何昭甫师，讳彤然，广西平乐人，翰林祭酒^[44]。

八月初八日，授室许氏。

道光十一年，辛卯，二十岁。

以从师无力，就馆丁家楼族叔诗帆家。因去安松严延绪家不远，仍就正佩之师也。

是春，因同入学第一之族侄夔昕以时疾殁，长子一岁，捷才苦学，族中咸惜之，予悲惋至废食寝。

四月，诗帆叔析居^[45]于山村曰“蛇沟”，予随往，易为“化龙村”。村不满二十家，皆农人，而地极幽僻，颇爽心目。

乡闹^[46]已届，赴试无资，以内子^[47]许氏奩饰质钱就道。与族兄守伟同行。录遗^[48]后入场，题纸下，首艺“诗书执礼”，一挥立就；录至三艺全毕，尚未继烛，反复谛视，意不惬，而已录，竟无如何。试毕归，初得报二十五名，旋又报十九名，草录模糊不可辨，数日文至，予十九名，二十五名则兄守伟也。贺客虽多，酬应转甚，填供^[49]谒师之费无所出，宗祠公项^[50]提二十金，彭松屏师赠二十金，亲友所贻^[51]不满十金而已。既赴省，刻卷座主^[52]许滇生师，庚辰榜眼^[53]，讳乃普；徐柳臣师，壬午翰林，讳思庄，已回京。复往冠县叩见第八房师^[54]嵩峻亭先生，讳山，甲子举人。

岁暮归里，长女鸛年于九月生。

道光十二年，壬辰，二十一岁。

正月，与守伟兄北上。松屏师复予二十金，东严师十六金，余则贻之亲族。报罢^[55]旋里。业师佩之兄已授临淄司铎，所遗半年馆席^[56]令接代之。

六月，到高家村安七表兄家。

道光十三年，癸巳，二十二岁。

以资斧无有，外欠复多，未与会试。设帐于夹仓，授尹、郭、王姓生徒四人，岁修^[57]二百缗^[58]，得小裕。益肆力攻苦。

道光十四年，甲午，二十三岁。

仍馆夹仓。秋染疫，几危。

十月二十二日，子凤年生。

《编年自记》注释：

[1] 山左：旧称山东省为山左。因在太行山之左，故云。（《辞源》）

[2] 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一带，明清政区属江南省。

[3] 庠生：明清称府州县学的生员为庠生。

[4] 乡贤祠：古代乡里供奉地方贤达的祠堂。

[5] 按察司：明清各省负责刑法的衙门，长官称按察使，相当于今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6] 布政使：明清省级行政长官，相当于今省长，官位只在巡抚之下。

[7] 殉明季难：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清兵攻破日照安东卫，厉氏不屈而死难。（《日照丁氏家乘》）

[8] 甲科：隋大业中以进士为取士科目，创科举制。唐守因之。唐制，应举者谓之举进士，试毕放榜合格者曰成进士，凡试于礼部者皆谓之进士。明清时，举人会试中式，殿试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通称进士，凡列衔皆先书赐进士及第或出身。

乙科：古代试科目名称。《汉书·儒林传序》，平帝时，一岁科式取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补文学掌故。唐宋时皆有甲乙科，明清称举人为乙科（也称乙榜），进士为甲科。

[9] 廩生、增生、贡生、举人：

明洪武二年，令府州县皆置学，规定府学生员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人月给廩米六斗。后来名额增多，食廩者谓之廩膳生员，省称廩生。增多者谓之增广生员，省称增生，无廩米，后来名额再增，称附学生员。清沿明制，廩生名额及待遇视州县大小而异，月给廩银四两。经岁科两试成绩优秀者，增生科依次升廩生，称补廩。廩生可依次升国子监学生，称岁贡。廩生应试，例须觅廩生具保，以防冒籍顶替等情称廩保。（《明史·选举制》）

贡生：科举制度中，生员（秀才）一般是属于本府州县学生。若考选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则不再是本府州县学的生员，而称贡生，意思是把人才贡献给皇帝。明清两代贡生有不同名目。明代有岁贡、选贡、恩贡和纳贡；清代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例贡。

监生：国子监（最高学府）生员的统称。资格由州县考试选拔后赋予，也可由皇帝特许，或由捐纳取得。

举人：明清乡试（省级考试）中式者称举人。取得举人资格后，便可做官。

[10] 《朱子家训》：又名《朱子治家格言》，是以家庭道德为主的启蒙教材。

[11] 《文昌阴鹭文》：全称是《文昌帝君阴鹭文》，简称《阴鹭文》，道教重要典籍。作者不详。

[12] 《魏元君劝世文》：魏元君著，魏元君（251~334年）女，俗名魏华存，字贤安，任城（今山东济宁市）人，西晋司徒文康公魏舒之女。幼而好道，常服气辟谷，摄生修静，志慕神仙。宋仁宗赐魏华存“紫虚元君”，宋哲宗封“高元宸照紫虚元道真君”称号。她还擅长书法，黄庭观墙壁上刻有其亲笔所书《上清黄庭内景经》。其代表作《黄庭经》是道教修持内丹的重要经典之一，在中国道教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3] 《刘文正公格言》：刘统勋著，刘统勋谥文正。清朝名臣，山东诸城（今高密）人，雍乾时与其子刘镛（谥文清）相继为相，以清廉著名。

[14] 《南窗梦弹词》：也叫“南词”。曲艺的一个类别。一般认为形成于明代中叶，其前身为“陶真”或“词话”。《南窗梦》可能为当时流行的弹词集子。

[15]《孝经》：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为旧学校启蒙教材。

[16]训：训诂，解释经书字义。也称“诂训”“训故”“故训”。明清以来渐成一专门学问，称“训诂学”，也称“小学”。唐柳宗元《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为文章，善小学”。后来分工渐细，大体分为文字、音韵、训诂三门。

[17]平仄声音：即格律诗用字的声调。

[18]上孟：即孟子上篇。旧时《孟子》一书分为上中下三篇。

[19]时文：即八股文。

[20]张京江：字玉书，安徽桐城人，清乾隆时名臣，被乾隆誉为“真宰相”。

[21]入泮：泮，同“畔”，岸，边。“泮宫”的简称，专指学宫。入泮，即入学。

[22]破、承；六比：八股文结构名称。明洪武八年。朱元璋颁布开科取士。是年八月，京师及各省举行乡试，次年三月，在京师举行会试。由于以往考试形式录取的人才不符合朱元璋的要求，深感失望的朱元璋遂于洪武六年下令停考。开始思考科举考试的文体问题。之后十年，他与刘伯温经过反复研究，创制了一种新的考试文体，这就是八股文。八股文作为一种考试文体，有它相对固定的格式，由破题、承题、原题、起讲、入题、提二比、中二比、过接、后二比、束小二比、大结等部分组成，结构严谨，章法细密。因此写作八股文是一种极严谨的条理化训练，逻辑思路不严密的人是写不好八股文的。

[23]《论语》：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录。儒家经典，语录体。旧时分上下编，为旧时启蒙教材。

[24]庠生：庠，为殷商时学校名称。庠生，科举时代称府州县学的生员。

[25]《学》《庸》：四书中的《大学》《中庸》两篇重要的儒家经典著作。

[26]朱注：指宋代朱熹对四书的注疏。

[27]《尚书》：儒家经典，为五经之一。（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加上《乐》（已失传），也称六经。

[28]处士：古代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荀子·非十二子》：“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

[29]大禊：禊，音qin，太阳旁边的云气，古人认为是不祥之气。大禊，大不祥、大不幸的意思。

[30]罄：尽。

[31]绳律：此指诗词格律。

[32]馆：本指学馆，私塾。此为动用，办学，讲学之意。唐韩愈《进学解》：“召诸生立馆下。”

[33]童子试：古代科举之县级考试，优胜者为秀才。

[34]不售：卖不出去，喻未考中。

[35]拔贡：古代科举三年一次会试（最高级别的中央级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经殿试以后定名为进士。

[36]四子：一说为“孔、孟、老、庄”，一说为“孔、孟、程、朱”，一说为“老子、庄子、文子（名辛研）、列子”等古代道家人物。《旧唐书·元载传》：“天宝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诏求照庄老列文四子之学者。”而下文所谓“四子书”，则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四书。

[37]修：束修，学费。《论语》：“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不诲焉。”

[38]文宗：明清时称提学学正官为文宗。

[39]下帷：垂下帘子，即闭门读书之意。



丁守存著作

[40] 时艺：也称时文，即八股文。

[41] 初覆：初步审核，初选。

[42] 资斧：旧时称路费叫资斧，也称“盘缠”。

[43] 枵腹：枵空虚。枵腹，空肚子、饿肚子的意思。

[44] 翰林祭酒：古代飨宴时酌酒祭神的长者，为一种荣誉称号。翰林祭酒，翰林院一种散官的荣誉称号。

[45] 析居：分居，旧时男子婚后分产，父母使之另立门户以独立。

[46] 乡闈：古代科举选拔举人的省级考试。闈：考场。

[47] 内子：古时男子称自己的夫人为“内子”。

[48] 录遗：清代科举制度。凡生员参加科考，录科未取，或未参加科考录科者，在乡试前再行补考一次，名为录遗。经过录遗考试后录取者即可有资格参加考试。

[49] 填供：填：补充、充作、用作。供，供应。

[50] 宗祠公项：旧时宗祠公基金，一般用于宗族公益或救助之事。

[51] 臛：集。

[52] 座主：也称“座师”，明清举人进士对主考官或总裁官的尊称。

[53] 榜眼：科举会试中式后皇帝亲自命题进行殿试后从进士中选出的前三名之一。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

[54] 房师：科举制度中，举人、进士对荐举本人试卷的阅考官的尊称。因为乡试、会试的阅考官各占一房阅卷，试卷必须经过某房的阅考官选荐方能取中，故有此称。

[55] 报罢：科举时代会试或特科试落第称“报罢”。

[56] 馆席：古代教师席位。馆，学馆，席，旧时教师被称作西席。

[57] 修：学费。

[58] 缗：本指串钱的绳子，此指成串的钱，旧时一千文为一缗。

超越血缘的爱

——记李保叶

于潇潇 张圣虎

24年前，一个难以养活的残疾女婴被辗转送到村妇女主任李保叶面前，面对没有人家愿意抱养的局面，这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李保叶在母爱的促使下把孩子抱回家。如今女婴王琳长大成人，选择了特殊教育职业，把爱继续传递给她的学生们。

在蒙阴县岱崮镇五里沟村乃至全县，李保叶和她女儿的事情广为传诵，当地人称李保叶为“世上最好的妈妈”，山东省妇联授予她省“十大优秀母亲”的称号。获得2013年度“山东好人之星十大年度人物”荣誉称号。



在2013年度“山东好人之星十大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

母爱天性促使李保叶收养残疾弃婴

李保叶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到女儿王琳的情况。1989年年关将近的时候，一位村民将装着弃婴的纸箱送到岱崮镇五里沟村村委大院。被包在被子里的小王琳嘴唇发紫，手足扭反，看样子只有一个来月大。

镇干部和村干部抱着孩子张家李家转了十多家，因为女婴身残体弱，没有一家愿意抱养的。眼看要过年了，村里决定让当时的村妇女主任李保叶先养着，等过了年再定去向。接过孩子的李保叶却再也没把孩子送出去，在丈夫王家礼的支持下，她买来村里最贵的饼干和牛奶，搅拌在一起，一勺一勺地将这个只有1.8公斤重的女婴养活了。

“好多人来劝我，怕孩子养不活，养活了也是个累赘。人都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我收下了孩子，我就是孩子的亲妈。”李保叶没有听取别人“为自己想想”的建议，她把孩子的小被子放在柜子的最底层，下决心把孩子养大，还要把孩子的病治好，并给她取了个好听的名字——王琳。从此，王家时常传出婴儿的啼哭和夫妻俩开心的笑声，有了这个可爱的小生命，夫妻俩干活更有奔头了，细心呵护着孩子的每一天。

“给孩子一个健康的人生是我最坚定的信念”

“一定要给孩子一个健康的人生！”抱着这样的信念，李保叶和丈夫抱着9个月大的王琳去了泰安一家医院。王琳被诊断为先天性马蹄内翻足，医生为她的双足实施了手术，可术后效果不理想。后来又去济南为王琳定做每只重达1公斤铁质矫正鞋，小王琳连续穿了三年铁鞋，仍然没能站起来。

1995年国庆节，听说湖南一家中医医院能治好小王琳的这种病，李保叶夫妇将东拼西凑的6000元钱藏在了煎饼里，带着小王琳再次踏上治病的道路。经过四个多月的治疗，六岁的小王琳终于能走路了。

“孩子高兴地喊‘我能走路了，我能走路了’，我和丈夫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一个劲地掉眼泪。”李保叶说。

而小王琳不知道的是，带去的钱很快花完了，李保叶赶回蒙阴挨家挨户借了两万多块钱，带去的煎饼也吃完了，王家礼给医院打工挑煤球，从一楼挑到四楼，每天挑四趟，挣点钱维持生活。



20年前李保叶母女



20年后李保叶母女

二十多年时间里，李保叶舍不得为自己添置一件新衣，却给养女买时下最好的衣服、吃食。奇迹发生的概率非常小，但是在毫无保留的母爱的作用下，奇迹就是发生了。没钱为王琳治疗手上的疾病，她就每天给她推拿，按摩各个穴位，慢慢地王琳的手就伸展开了。那时为给王琳治病，李保叶欠下了3万多元的债，用了13年时间才最后还清。

“我只是做了一个母亲该做的事”

为了挣出供王琳上学的学费和治病的欠款，李保叶包下村里120亩荒山，和丈夫吃住山上。打钎、放炮、栽树、修路。李保叶的一双手布满老茧和裂口。即便是这样，还是有资金紧张的时候。

在正值青春年华的王琳的笑脸上，丝毫看不出她为自己身体的残疾或者家境困难而苦恼自卑。2005年王琳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潍坊幼师特殊教育学校，校方被李保叶的事迹所感动，特许录取了手脚不十分灵便的王琳。

“从小我就教育王琳，生活的一切靠自己，鼓励她树立自强不息的精神。”李保林的悉心培养换来一个阳光坚强的姑娘。在王琳看来，自己没有不能干的事，只是要比别人多花些功夫罢了。

2010年，毕业后的王琳，毅然选择了特教这份需要用爱去支撑的职业。每天给几名培智儿童上课。选择了特殊教育就选择了奉献，特教是一份需要爱心和耐心才能从事的职业。瘦弱的王琳有一颗善感的心，她说正因为自己是残疾人，所以她更懂残疾人的需要。“是妈妈的爱和坚持，成就了今天的我。”王琳说她要把这份爱传递给她的学生们。

“我只是做了一个母亲该做的事，任何一个母亲都会像我这么做。”李保叶说不认为今天的王琳是个奇迹，她只是尽自己所能让孩子平平安安长大，过正常生活。”

一个排球女将的“悬壶之梦”

——李琪其人

胡爱军

李琪，高挑身材，齐耳短发，圆润的面庞白里透红。言谈举止，雷厉风行。一身洁白的隔离衣，透出一股蓬勃的朝气。

你根本意想不到，这位文质彬彬的内分泌科主任、省内两所医科大学的兼职教授，曾经是全国高校风靡一时的排球女将——山东中医学院大学生女子排球队的主攻手，人称“省中医学院的郎平”，外号“铁榔头”。

“铁榔头”叩开悬壶之门

李琪1963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市（现临沂市兰山区）。小学三年级就被家里送进县业余体校排球队，有非常扎实的排球功底。她和小伙伴们曾多次代表县里参加全地区青少年排球比赛，并多次荣获冠军。李琪对排球运动有独特的天赋，在训练和比赛中能吃苦，能拼抢，被教练当作重点培养的“好苗子”。当一名叱咤风云的体育健将是她青少年时期曾经的梦想。

李琪身上既有革命家庭的血统，也有中医世家的血脉。她的祖父是老家的





一个土财主，由于不堪官僚兵匪的欺压和洋人的凌辱，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在解放潍坊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父亲早年也跟随祖父参加了革命队伍，新中国成立后，是临沂地区外贸系统老一辈创始人之一。李琪的祖母是中医世家，几代人开中药铺，悬壶市井，济世一方。由于受特殊家世的影响、熏陶和启蒙，她在排球运动中养成了不怕吃苦、敢打敢拼的性格，同时也悄悄萌发了当一名医生治病救人的“中国梦”。

1980年，她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省中医学院，成为恢复高考后临沂外贸家属院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就此踏上了自己的圆梦之路。同时，她也没有放弃伴随自己成长的排球运动，成为本校女子排球队的一号主力。

李琪在省中医学院这5年，适逢中国女子排球运动的巅峰时期。从1981年到1984年，中国女排连续夺得第3届世界杯冠军、第9届世界排球锦标赛冠军和洛杉矶奥运会金牌，成为中国女排的“三连冠”。中国女排主攻手“铁榔头”郎平一举成名，她和美国名将费罗拉·海曼、古巴名将米雷亚·路易斯并称当时世界女排“三大主攻手”。郎平成为李琪心目中的第一女神。

中国女排“三连冠”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排球风暴”，中国各个城市包括乡村所有的运动休闲场所，几乎都能见到人们开展排球运动的身影。在这场“排球风暴”中，李琪可谓天随人愿，大显身手。她和省中医学院女排的队友们一道，一路打拼，连年夺得山东高校大学生女排冠军。1985年，她带领山东中医学院女子排球队，代表山东高校参加了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由此，“山东中医学院的郎平”“中医学院女排的铁榔头”便成为李琪的代称和雅号。

李琪在比赛场上表现出色，在学习方面也毫不逊色。在大学这5年里，她拿出赛场上那种拼劲，攻克学习上的一道道难关，以优异成绩完成了中医药专业所有课程，获得了学士学位。“铁榔头”终于叩开了通往祖国医学宝库的厚重之门。

毕业分配时，她谢绝了母校让其留校任教的善意，毅然返回梦牵魂绕的哺育自己成长的沂蒙老区，在市中医医院当了一名普通中医医师。

圆梦之路的艰辛与愉悦

祖国医学源远流长，积淀丰厚，博大精深。能够悟出个中三昧，悬壶坐诊，祛病疗疾，非一日之功。“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是李琪从医30多年的深切感悟。

她参加工作不久，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例黄疸型肝炎病例，患者之前吃了十几副中药，黄疸一点没退，却找不到原因。李琪看了药方，方子很顺眼，和教科书上讲的别无二致，无可挑剔，这十分令人费解。后来，有人把患者介绍到本院名老中医刘启廷先生那里。刘老擅长看肝病，吃了他的药，病人三天黄疸就退了。再看看刘老的处方，其遣方用药与教科书上讲的截然不同。刘老治肝病，主张清热化湿，方子里加了中医火神派擅用的热药干姜。用中医的行话说，整个方子看起来轻飘飘的，却起到了药到病除的功效。李琪说，当时自己很诧异，看不懂。通过这件事，使她对刘老的医术肃然起敬。

李琪到市中医医院工作之后，先是在本院内科主任孙玉甫先生门下跟师坐诊。孙玉甫老家苍山，即现在的兰陵县，他靠自学成才考入市中医医院。李琪回忆说，师傅很有才气，医术很高。他临证施治与“学院派”不同，多从古书、名家、验方中选择治则方药，疗效显著，来找他看病的患者很多。李琪对他崇拜有加。后来，她又与临沂医专中医教研室史中经主任一起工作，史主任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医术医德为人称道，与其共事受益匪浅。

李琪说，她从这些老先生身上真正领悟到祖国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感觉自己在大学里学的不过是九牛一毛，肤浅得很。

1995年，经山东省卫生厅、人事厅批准，李琪成为名老中医刘启廷先生的首批入门弟子之一。刘启廷是全国第二批国医大师候选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山东省中医继承指导老师。他1934年生于安徽省宿州市，自幼酷爱医学，1950年考入国家治准委员会医训班，后分配在工地医院工作。其后又师从当地名医高金藩，尽得其传。他熟读《内经》《难经》《伤寒》《金匱》等十多部中医典籍，学识渊博，医理精深，誉满杏林。他主张中西医结合，既善于继承，又勇于创新，重视临床资料积累，在内外妇儿科疑难杂症治疗方面经验丰富。李琪从师三年，刘老先生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使其学业大进。

李琪从师学习，不仅勤于耕读，而且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归纳，博采众家之长，择善而从。其治学之道，遵从“书非深不能精，非熟不能用，非博不能广”的师训，博览群书，精心研读。临证治法，坚持“学古不泥古，学中不弃西，重在实践创新知”，同时做到“识病循因，治病固本，用药慎重而精炼，圆融活便，轻灵而平稳”。

1997年，她和刘老的另一个弟子高阳一道，将老先生的学术思想、治学经验、医疗特点、学术和科研成果，包括刘老多年积累的临床常见病的有效验方、疑难杂症验例、中医养生保健方则等等，加以整理归纳，编纂出版了《刘启廷医学经验荟萃》一书。该书在业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多次再版发行，成为启迪后学不可多得的实用教材。

1998年，在刘启廷先生的指导下，李琪主持完成的“糖肾康治疗2型糖尿病肾病的临床研究”项目，获得“临沂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临沂市首界青年科技奖”。这是李琪从医以来在体育竞技场之外拿到的第一个“一等奖”，也是本市设立科技进步奖以来，中医界首次获得的“一等奖”。在她看来，这个奖项不亚于中国女排在国际



大赛中实现“零的突破”，为此她内心充满了欢欣和愉悦。

辨证施治的“白猫黑猫”论

自从现代西方医学流入中土，医学界关于中医西医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的争论就从未休止过。同时，中医自身的传承与发展也是一波三折。时至今日，医学界对国家现行的中医药教学体制、传承方式仍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这方面，李琪没有丝毫的门第之见。在她看来，学术界的争论是推进世界医学发展的催化剂。与西医相比，中西医结合只不过在疾病治疗和防控方面多了一种手段和方法。病人来医院是为了看病，不是为了看中医或者西医。无论中医西医，达到理想疗效才是良医。中国的抗疟“神药”青蒿素在全世界范围推广应用这一事实，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明。

她曾多次参加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举办的内分泌学习班，2002年在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进修学习，师从国内著名内分泌专家李光伟、全小林教授，因而在西医内分泌专业理论和治疗技术方面同样有牢固的基础。

李琪长期致力于中西医结合治疗内分泌疾病的临床研究，特别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以及治疗甲状腺疾病、高脂血症、肥胖、痛风、骨质疏松等代谢性疾病，经验丰富，自成一系。

糖尿病是当今世界仅次于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三大非传染病性疾病，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世界性公共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因糖尿病引起双目失明者占8%，比一般患者高出10至20倍；并发肾功能衰竭者比一般肾病高17倍。按世界同一标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糖尿病患者的眼、肾、神经并发症在世界上最早、最多、最严重。为此，李琪将其作为自己临床科研的重中之重。

在临床治疗中，她将辨证论治贯彻始终，同时借助现代医学检测手段，依据实验结果，有针对性的遣方用药。比如，对高胰岛素血症者，注重健脾化浊，酌加苍术、白术、太子参；对低胰岛素血症，则脾肾双补，阴阳双调，宜以猪胰以脏补脏；对空

腹高血糖者，则从“血中伏火”论治，重用知母、地骨皮、牡丹皮等清热凉血；对餐后血糖过高者，则健脾清热并重；对高血糖者，重在治肾，予五味子、覆盆子、芡实等补肾固涩。针对老年糖尿病患者，则不唯“三消”分论，临床用药亦不拘前人成方窠臼，而是根据老年人的发病特点，总结出“益气重在健脾，滋阴勿忘温肾，治标兼以泄浊，活血贯彻始终”的治疗法则，验之临床，每每奏效。

她根据临床经验，提出了“三系并重”治疗糖尿病的观点。一是“系统教育”。倡导“治未病”，主张未病先防，遏其未成，已病防变，截其未传。二是“系统治疗”。针对糖尿病多因素发病的特点，从整体观念出发，对患者进行食、神、体、药系统治疗。三是“系统监测”。通过对患者各项指标全面系统检测，确保治疗达标以稳定病情。同时，对糖尿病并发症患者，按照中医的整体观念，辨证与辨病并重，溯本求源，标本兼治。比如，对并发肾病，证见水肿、蛋白尿或肾功能不全者，按脾肾两亏、阴阳俱虚论治，予真武汤加味以健脾补肾、温阳化气、活血降浊；对并发周围神经病变者，则循“血痹”证治，予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味以养血活血、祛风通络；伴有眼底视网膜病变者，可在基础方中加三七、蒲黄、青葙子等滋补肝肾、活血通窍明目；并发神经源性膀胱，证见尿闭或尿失禁者，则予金匱肾气丸加味以鼓舞肾气，制约膀胱。由她研发的“糖肾康”“糖视康”“糖抗宁”“糖宁片”等糖尿病系列药品，经多年临床验证，效果理想可靠，得以在多地多家医院推广应用。

“治未病”，是我国传统中医理论的核心内涵之一。《黄帝内经》主张：“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据此，李琪特别重视对患者的糖尿病防治知识的普及教育。她带领全科医护人员，组建了由医生、护士、营养师组成的糖尿病教育团队，围绕难治性糖尿病对患者进行强化教育。迄今为止，已开展的小组教育受众达1万余人次，进行个体强化教育的患者达6000余人次。通过糖尿病防治知识教育，患者按照所学内容加强自我监护和配合治疗，平均血糖控制达标率为50%以上；经过强化个体教育的患者血糖控制达标率达80%。实践证明，这一举措特色鲜明，行之有效，对于进一步提高降服糖尿病这一顽症的治疗水平，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李琪因此于2011年荣获山东省“健康教育大使”荣誉称号。

2003年，在李琪的主导下，市中医医院成立了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的内分泌专科。该科成立以来，治疗糖尿病等内分泌疾病患者数万人次，中药治疗率达80%以上，有效率在95%以上。同时，她带领全科医护人员团结协作，成功抢救了多位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渗性昏迷、低血糖昏迷、甲亢危象、肾上腺危象、低钠血症昏迷等内分泌急症患者。本科开放床位也比初创时翻了一番。在她的领导下，2007年，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被市里确定为“临沂市慢性病防治中心”。2008年，顺利通过了市里组织的“临沂市重点中医专科”考核验收。2015年，通过了“临沂市特色中医专科”验收。

梦想是一条生生不息永不干涸的甘泉

屠呦呦是令李琪高山仰止的另一位大师级女神。

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和一名日本科学家及一名爱尔兰科学家分享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疟疾治疗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屠呦呦由此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本土中国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由此实现了中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零的突破。她在获奖感言中说：“我不是以获得诺贝尔奖为终极目的”，“我唯一的追求是：抗疟、治病”，“终有一天，我将告别青蒿，告

别亲人，如果那一天真的来到，我希望后人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一片青蒿之间，让我以另外一种方式，守望终生热爱的土地，守望青蒿的浓绿，守望蓬勃发展的中国中医事业”。

屠呦呦的话，道出了每一个有志于弘扬光大祖国传统医学的中医药工作者的心声，同时也表达了李琪多年来为之奋斗的梦想。

为了继承发扬祖国传统医药学、培养造就高层次中医临床人才和中药技术人才，国家于上世纪90年代启动了“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前面说过，李琪是我市首个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的指导教师刘启庭的首批继承人，现在她是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刘启廷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负责人。

工作室建设自2011年开展以来，李琪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目前，她的团队已经发展到13人，其中高级职称5人，中级职称7人，硕士研究生3人。她和她的团队坚持以中医药技术服务为主要手段，以“弘扬中医文化，传承名医经验”为核心宗旨，以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为目标，在对刘老学术经验的收集整理、传播交流及推广应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对刘老在医生的德、知、智、悟方面的思想观点，症、病、证、论及理、法、方、药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以及中药的性味、归经、功能、专长、加工炮制、剂量搭配、方剂的君臣佐使组方原则、用药方法等，均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加以归纳总结，整理成完整医案和论文、专著。几年来，共总结整理刘启廷中医诊疗病案135余例，撰写读书临证心得70余篇，跟师笔记320余篇；收集整理与刘启廷老中医相关的书籍17部、学术论文约136篇、各种医案和跟师笔记30万余字。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篇，并连续在《中国中医药报》刊登“刘启廷经验方解读”45篇，近12万字。以刘老的学习笔录为主题，整理出版了《临症求真》一书；总结刘老的中医养生保健经验资料10万余字，编辑出版了《健康的绝窍》一书。

他们在学习继承刘老的学术经验过程中，十分注重临床应用这个环节。他们将刘老所擅长的治疗瘰疬、消渴病、消渴病痹症、咳嗽、肺胀、喘症等六个病种的典型病例、诊疗方案整理归纳后，在本院内分泌科、呼吸科等科室推广应用，收到了良好的临床效果。同时，根据刘老提出的“感冒病因无热论”及其遣方用药，研发了“苏柴透热颗粒”“固本解热颗粒”“小儿表虚易感膏”“小儿易感扁桃体肿大膏”“小儿易感阵咳膏”等院内制剂，经临床验证，都达到了理想疗效。其中，“苏柴透热颗粒”和“固本解热颗粒”已经在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了医疗机构制剂注册。

这些年，李琪和她的团队在工作室建设中所付出的努力，为推进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培养更多的优秀中医药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梦想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古人擅长托梦，他们寄梦想于夸父，想把天上的太阳摘下来放到人们心里面；寄梦想于女娲，想炼五彩石修补苍天以济苍生；寄梦想于牛郎，想娶天上的仙女为妻以营造幸福家园……。欧洲人的梦想更为直接，他们把羽毛捆在自己身上从高处跳下去，梦想能够像鸟儿一样自由飞行。假如没有这些梦想，根本就不会有今天的飞机、飞船、光伏、基因工程、填海造岛，更不会有人类乘坐飞船光顾月球的壮举。而这些梦想都是人类对于保护生命、延续生命乃至生命永恒的不懈追求。

李琪和她的同行们所做的一切，正是实现人类梦想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由衷的祝愿他们在圆梦之路上不断取得新的辉煌。

市史志办主任、党组书记朱海涛上“两学一做”专题党课。6月16日，市史志办主任、党组书记朱海涛上“两学一做”专题党课。党课以“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做合格党员”为主题，主要讲了三个方面内容：一、勇于担当、甘于奉献是共产党员的核心价值观；二、勇于担当、甘于奉献是推动地方史志工作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三、如何做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合格党员。强调以党章为依托，做对党忠诚的表率，做勤奋好学的表率，做勇于担当的表率，做廉洁自律的表率，做甘于奉献的表率，在实际工作中凝心聚力、砥砺奋进，为加快史志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为建设“大美新”临沂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市史志办副县级以上干部到“刘少奇在山东纪念馆”接受党性教育。6月29日，市史志办由党组书记、主任朱海涛带队，全体在职副县级以上干部到临沭县参加党性教育活动。

他们参观了“刘少奇在山东纪念馆”“党章的历程展馆”，听取了“1942年刘少奇山东之行的贡献和启示”的辅导报告。大家认真听取讲解，驻足细览，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一幅幅生动的历史图片，生动再现了刘少奇同志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大公无私的崇高品质以及他对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身的伟大情怀。领导干部纷纷表示，此次参观学习从思想和心灵深处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

市史志办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7月7日，市史志办召开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作了学习发言。朱主任要求，全办上下要充分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意义，深入领会讲

话主要精神，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认真做好讲话精神的宣传阐释。要把学习贯彻“七一”讲话同思想实际、工作实际相结合，助推全市史志事业健康发展。

市史志办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德廉知识测试。7月中旬，根据市委、市纪委统一安排部署，市史志办科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分两批参加了德廉和党风党纪知识集中测试，取得了平均96.36分的好成绩。

《山东水库之母石泉湖》出版发行座谈会召开。6月2日，《山东水库之母石泉湖》出版发行座谈会召开。会上，本书主编李祥琨介绍了该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情况，石泉湖村负责人介绍了该村的历史。

《山东水库之母石泉湖》一书由黄河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57万字，分“光辉历程”“激情回忆”等十一部分，收录历史照片约200幅，真实生动地反映了红色根据地农村的抗战史、解放史、创业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地情资料著作。

各县区史志办开展“结亲连心”走访活动。6月下旬至7月上旬，各县区史志部门贯彻市委精准扶贫工作精神，纷纷到“结亲连心”联系村进行走访。

在联系户家中，史志工作人员详细了解每户家庭近期的生活、工作、生产状况和所遇到的困难，同时对联系户的联系信息进行了确认，对群众提出的一些政策性问题，都逐一解答。对于不能当面给予群众解决的困难和诉求，工作人员进行了记录，向上级网格进行反应，协助群众解决难题。

《郯城县地方史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年）》印发。

《临沭县地方史志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印发。

兰山区史志办到临沭县考察交流

二轮修志工作。7月21日，兰山区史志办主任王友存一行5人，到临沭县史志办考察交流二轮修志工作，并进行了座谈。

莒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到沂水县交流史志工作。7月6日，莒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史宗义一行4人到沂水县交流史志工作，并进行了座谈。

《郯城县志2000—2014》编纂调度会召开。7月11日，郯城县史志办《郯城县志2000—2014》编纂调度会召开。会上，各县志编纂小组汇报了编纂、修改工作的进展情况以及当前工作中的重、难点问题。根据县志资料的搜集已经接近尾声的实际，对县志编纂工作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和安排，力争在2018年上半年圆满完成县志编修工作。

“红色文化”成为沂水史志资政育人新亮点。为传承红色文化，发挥史志资政育人职能，沂水县史志办在院东头镇桃棵子村沂蒙红嫂祖秀莲纪念馆设立沂水红色文化开发利用服务基地。

沂蒙红嫂祖秀莲纪念馆以文、图、照片、影像、雕塑和实物相结合的形式展示了祖秀莲勇救八路军伤员的真实故事以及发生在沂蒙境内的战役史册等资料。该纪念馆的建成，宣传了沂蒙红嫂在革命战争年代“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精神，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党员干部教育的生动课堂。